

故事照亮未来（来自台湾重要的理性声音，呼唤一个开放的中国）

杨照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参与者、见证者、反思者，或许也是最会讲故事的评论人。他用100个故事做引子，为我们讲述台湾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种种经验和弯路，希望人们能在这个光明与黑暗相互交错的时代，重新拾回对公共事务的责任心和参与感。

杨照从千头万绪的故事和现实中提取出一百个关键概念，如协商、和解、法律、制度、身份、记忆、媒体.....对于我们理解社会的本来面貌有着提纲挈领的引导作用。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开放时代，充满各种不同的要求、利益和经验，如果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努力的方向，或者没有任何准备，将无法适应我们理想中的那个未来，而书中的这些故事，或

许可以成为我们努力或避免的方向。

杨照擅长将繁复的概念与厚重的知识化为浅显易懂的故事，写作经常旁征博引，在学院经典与新闻掌故之间左右逢源，字里行间洋溢人文精神。并流露出文学情怀。杨照近年来积累了大量评论文字，以公共态度探讨公共议题，树立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与榜样。

作者：杨照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类型：选载 性质：

免费阅读 定价：39.0元 《故事》照亮未来

文前部分

台湾是全球华人社会之中第一个真正成功转型为现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地方，所以它才会让我们这些住在其它地区的华人如此关注，以之为参照，视之为样本。可是在观察它的过程里头，我们却又发现了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

台湾不是已经拥有很充分的言论自由了吗？为

什么它的言论自由没有催生出健康的公共言谈，反而恶质化为一场又一场的名嘴口水仗？台湾不是已经拥有很独立的司法体制了吗？为什么它的司法问题还会搞得这么严重，弄出一次又一次的争议甚至丑闻？

梁文道：杨照的伦理寓言(1) 一

小时候听老师说故事，最后总是要来一个“教训”；就连小朋友上台学说故事，也要效法师长，以“这个故事的教训是”做结；教训来教训去，令人生厌，完全杀掉了听故事的天然愉悦。于是有点文学兴趣的少年总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刻意远离教训，转而注意故事到底应该怎么说。我们不再在乎一个故事的寓意，变得比较留心它的叙事角度、情节结构，以及语调的安排。再简要地说，一个成熟读者首先关心的通常不会是一个故事“讲的

是什么”，而是它如何讲出它要讲的东西。

然而，我们还是很难否认幼年那种看故事要看教训的阅读态度的价值。最起码，它教懂了我们什么叫做“寓言”，这种最基本的修辞方法，以及最基本的人类认知范畴。《伊索寓言》和《世说新语》曾是无数人处世之道的启蒙，创世神话则是先民了解宇宙源起和世界秩序的模式。那些故事一方面建立了我们的底线人格，给出至为基础的价值和世界观；同时也让我们学懂了一种有效的沟通方法，懂得用故事、例子等种种寓言修辞去说服、劝诱和传播。

正因为这种“故事加教训”的寓言阅读太过常见，反而令人容易忘记它其实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要不然何以过了这么多年，世上始终只有一部《伊索寓言》？上佳的“故事加教训”不只是把一个已经很完整的教训装进

一则同样很完整的故事，有如容器盛载了内容，水瓶存放了水；相反地，那些故事的情节同时也该是个说理的步骤，推动其前进的剧力也应该是某种真相渐次敞示的过程。换句话说，故事不是传递信息的包裹，而是构成一则信息的骨架，甚至是发现和发明某项事实与观点的道具。所以，当我们称赞一位作者很会用故事去“讲道理”的时候，除了是因为他很会打包教训，使其份外悦耳动听、容易消化之外；恐怕更是因为他深明故事的思考之道。他的故事不是可以和教训彻底分离的外壳，而是内在于教训的观察角度及推理程序。由此可见，听故事要听教训，与听故事要看它好不好听，便不是能够截然二分的两回事了。

杨照不只是当今台湾评论界其中一位最博学最富洞察力的健笔，也是整个华文世界里最擅长

以故事去讲教训的故事大王。原因简单，不在于他的学识背景，而在于他本是一位诗人、一位小说家；他懂得用故事去观看社会，以故事去分析政治。那么，在他这部大陆第一本“故事集”《故事照亮未来

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里头，他到底想说些什么“教训”呢？ 二 《故事照亮未来

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的台版原名是《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最初看见，这个书名还真能吓人一跳，因为它似乎太过煞有介事，道德说教的意味太浓，保守、传统而且古老，几乎不像是任何一个现代评论家会喜欢取用的名字，尤其不像杨照著作的书名。毕竟，他是一个生活在当代社会里的知识分子，而且受过完整的高等学术训练，他应该深知任何想要教化人心的努力在这个时代都会遭到无情的怀疑甚

至嘲讽；他也应该晓得我们已经不再相信有谁能够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特别是道德上的真理，从而大胆指导别人立身处世的道理。

既然如此，何以杨照还敢写下这一大堆文字去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呢？虽然他曾经有一部叫做《理性的人》的评论集，名字一样宏大而骇人；可是这一回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还用上了“如何”二字，使得这本书活似一部指南。

没错，一部指南。假如《理性的人》是在正面析介“理性人”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人，述说他的构成条件与周遭环境；那么《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就是来到更具体的实践层面，宣讲一种应该怎样做人的道理了。勉强地区别，前者属于“实然”的论说，后者

则属“应然”的探讨。 三

这让我联想起近代哲学史中一度存在过的一对极其相关但又明显不同的概念区分，那就是“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和“伦理学”（Ethics）了。表面上看，这两种关于人类实践生活的哲学探究是没有多大差异的，反正它们讲的都是伦理道德，所以现代大学的哲学课也经常混用这两个名词。同样的理论，一会儿说是“伦理学”，一会儿又说它是“道德哲学”。

oral

可是对于许多先哲而言，这两个名词却有着微妙的差别。粗糙并简单地讲，“道德哲学”关心的是更一般更抽象的原理问题，比方说：“什么是善？”

可是对于许多先哲而言，这两个名词却有着微妙的差别。粗糙并简单地讲，“道德哲学”关心的是更一般更抽象的原理问题，比方说：“

什么是善

？”，“道德律则应当如何证成？”以及“假

如自由意志是虚幻的，人类还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至于“伦理学”，它的对象范围就比较微观比较具体了，例如18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的《哲学伦理学》（Ethica Philosophica），里面谈到的几乎全是“如何控制我们的低级欲望”、“如何敬拜上帝”和“怎样对付沉闷”等非常实际细碎的课题，和我们今天熟悉的伦理学很不一样。

我假借这个区分，用来联想《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的性质，把它界定为一部教人在这个政治秩序及社会环境急速变动的时代里，应当如何把握方向、如何沉静思考以及如何稳定心性的“伦理故事集”。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再多说两句有关政治与道德之关系的问题。首先，我们知道学术界曾经

把道德排除在政治之外，纯以实证的科学态度去研究人类的政治生活，并以之为政治学正宗。根据这种主张，我们不应该研究一个政党的路线转变算不算背叛，因为这是个无法得出客观结论的价值问题；同样地，我们也不必追问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是否正常，因为它是个价值问题，不能用事实的调查与数据的分析去说明。根据这种主张，我们应该研究的是一个政党的路线转向的抉择是否理性，它和其它政党在下一盘怎么样的策略棋局；根据这种主张，我们不用比较君主制与代议民主制的良窳，只要去描述它们的特色，分析它们如何成形如何衰亡便好。

一般认为，这个战后以来的主流主张是要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才开始转变。在那十年，以罗尔斯（John

Rawls) 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家把政治带回到了哲学里面，也把哲学 尤其是道德哲学带回到了政治研究。于是大家重新开始质问一个怎么样的社会才算得上是正义的社会，一个怎么样的制度才能叫做正当的制度。 四

然而，身为一个评论家，杨照的主要关怀不在于这些政治哲学上的大哉问，起码不是在这本书里去谈这些问题；他试图在另一个层面上将价值注入到政治机器之中，使运转得过于流畅乃至过于油滑的政治游戏稍微顿滞，让充满算计因而变得太过冷酷的头脑稍微温润。

台湾是全球华人社会之中第一个真正成功转型为现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地方，所以它才会让我们这些住在其它地区的华人如此关注，以之为参照，视之为样本。可是在观察它的过程里头，我们却又发现了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

台湾不是已经拥有很充分的言论自由了吗？为什么它的言论自由没有催生出健康的公共言谈，反而恶质化为一场又一场的名嘴口水仗？台湾不是已经拥有很独立的司法体制了吗？为什么它的司法问题还会搞得这么严重，弄出一次又一次的争议甚至丑闻？

于是有些人就开始把台湾这个模范生打成坏榜样了，他们说：“你看，这就是民主的后果！”“你看，这就是开放的代价！”“看你们还有谁敢说学台湾。”然后又有人出来帮台湾说话，告诉我们台湾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它很好，其实我们都只是被媒体误导了

阅读杨照评论多年，我发现他的目的不是怀疑，更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台湾政治社会转型的大方向，进而赞赏甚至肯定其它的代替方案，比方说近年甚嚣尘上的“中国模式”；更不是

为台湾辩护，以动人的言词述说“台湾真好

梁文道：杨照的伦理寓言(3)

”的小故事，这不是一个台湾评论者该做的事

。 五

杨照不是一个“道德哲学”意义上的思考者，潜心探究自由的价值与证成民主之必要；因为他实在没有这个需要，这早已经是台湾整个社会的共识了。在肯定这些共识的前提底下，他想令我们了解的是光有这些共识还不够，光有这些大方向还不行；我们需要的是使得这些共识得以落实，使得一艘轮船得以朝向既定目标顺利航行的实际条件。

言论自由和媒体开放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在这些高远理想和名嘴肆虐的恶心现实之间划上单纯的因果联系，好像基于前者就一定要接受后者；这中间还要补上其它必备环节。尊重法律

也是对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法条可以毫无中介不经诠释地扩大到这个社会上去，以致于形成法律的暴力。更直接地讲，杨照是希望在台湾社会转型的理想与实况之间寻回那失落的链条，在政治游戏和种种社会机制里头添补那少掉了的零件。

那些链条与零件便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伦理学”了。相比起宏大，高远而抽象的理念和原理，它更注意实现理念与原理的方式。它是一连串具体的操作规范，就和鲍姆嘉登所探究的那些问题一样具体；比方说“结社如何孕育创意”、“议题为什么是选举的核心”、“政治人物应该怎么迎接下台”

杨照之所以持续不懈地执著于这些问题，是因为他掌握到了，在我看来今日台湾以至于其它华人社会最最要紧的关键：不是没有正确的理

念，而是没有使之具体成形的方法与策略。这里所讲的方法与策略，绝非冰冷功利残酷的权谋计算，而是蕴含价值的践行性规范，所以大陆读者一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听一听杨照这批原来说给台湾人听的故事。因为我们都知道“为人民服务”是对的，但可能不太知道怎样才能使它落实成真；我们也都晓得微博言路的开放总是一件好事，却不晓得应该如何面对大众发声年代的造谣和伤害。于是我们总是在“为人民服务”究竟是说真的还是骗人之间对骂，把微博的问题变成是好还是不好或者管还是不管的二元选择。理想我们说了太多，理念我们不缺，只不过我们欠缺具体实践和衡度它们的微小工具与对策。这正是杨照的用心所在。杨照不把目光朝上，他的话不是说给当权者听的。他就像一个在民间晃荡的吟游诗人，又像

一个上古时代荒原部落的预言者，他用接连不断的故事掩护精密的论述，对着他的读者，说明世间万物的运行法则。尽管他总会像一个尽责的老师，在这些故事之后明确给出联系到当下处境的“故事教训”。然而，他说故事的技巧及语调却足以使听众明了那句古训：“单是故事，便已包含一切。”

张铁志：文化评论与公共领域

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仍处于巨大转型的阶段。岛屿已经朝向民主化与本土化启航，但路程仍然颠簸，方向尚未确定。毕竟，在1991年时，还有校园白色恐怖事件的独台会案，“国会”还没全面改选，“总统”还没确定直选。而关于社会经济的改革之路，更是一片混沌。

那也正是我的大学时期。过去“党国体系”灌输的旧价值观与世界观正逐渐崩塌，我焦急且

焦虑地大量追求知识，面对各种新价值观的冲击，并寻找理解台湾和世界的新姿势。从研读老马新马到台湾史，从阅读进行式的《岛屿边缘》、《当代》杂志，到在唐山书店搜罗我错过的《南方》、《人间》等杂志。

此外，各种政治文化评论不断涌现，以试图探照这个黑暗与光明交错的时代。这些评论者中，对我影响最深就是杨照。

彼时杨照刚开始逐渐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1991年出版第一本评论集《流离观点》，然后在一两年内接连出版《异议笔记》、《临界点上的思索》等评论文集，明确高举“本土左派世界观”的旗帜

而这正是当时我们这些反叛青年试图思索建立的价值方向。而他的小说《大爱》和刘大任的《浮游群落》、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所描

绘的理想主义青年形象深深震动了我。刚在《人间》副刊开始连载的散文《迷路的诗》，则被我一篇篇小心翼翼地剪下来（我那时是剪报收集狂）。

那是台湾文化评论的美好时光。报纸提供了重要空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秀贤、刘克襄主编的《自立早报》副刊），且有许多思想评论性杂志，为台湾公共领域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杨照一步步成为台湾最知名的文化评论写作者，而我毕业、出国念博士、开始写作，不自觉地仿佛跟着杨照的脚步（中间一度与他在《新新闻》共事，他是总编辑）。然而，当我们两个以不同的步伐往前走，这个时代所有坚固的东西似乎逐渐烟消云散。

随着形式民主取代威权压迫，随着全球化与市

场化成为政治压抑之后的王道，台湾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丰盛的公共论述领域逐渐萎缩，许多新价值尚未广为传递就被扭曲，尚未深化就被遗忘。例如本土这个价值观，一派将其无限神圣化，另一派将其彻底妖魔化。又例如前几年对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严重误用与误解。当然，还有更多公共价值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在现实的实践意义，一如杨照这本书提到理解开放社会的一百个关键词。

事实上，台湾公民社会早已日益成熟，只是常被囚禁在媒体与政治的荒谬困局中。一方面政治人物对口号与选举比论述和政策更有兴趣，且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野合不论两党都一样紧密。另一方面媒体的新闻报道党派化、琐碎化与八卦化，电视上高谈阔论的谈话头（talking

heads) 以为仿佛他们真的代表民意。尤其，在这个追求轻薄短小的时代，深度评论与报道仿佛成为毒药，只有新兴的个人博客和另类网络媒体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民主化走了二十年，我们的公共论述领域在成熟之前就已经面临瓦解危机，且我们依旧在价值观的崩塌与重建中徘徊。

而这二十年来，杨照始终是一个勤劳且负有使命感的评论者；二十年来，我也从一个他的读者走上与他近似的评论写作者之路，虽然我们的取径有所不同，虽然他始终走得太前面。但无论如何，从《流离观点》到这本《故事照亮未来》，我在他的文字中学习到如何透过书写去试图让我们所学的学院知识更公共化，让我们的书写作为武器去对抗时代的衰微，并希望为台湾公共领域的重建扮演一点小小的力量。

自序

在台湾念大学，后来到美国念研究院，我所受的专科训练是思想史。选择思想史，当然是因为对人在想什么，也对人如何表达自己所想的，有高度兴趣。多年研读思想史，看过那么多古往今来的思想内容，进而获得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 看重观念，相信观念的力量。

具备什么样的观念，我们就变成了什么样的人。观念不必然都能化为行动，然而没有任何行动背后是没有观念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都是观念。

连带地也就相信，要了解一个社会，必须了解这个社会抱持什么样的观念，相信什么。还有，要改变一个社会，也就得要先改变社会上人们的观念。

这本书中的篇章，最早是台湾《新新闻周刊》

的专栏，专栏的名称再简单不过，就是“观念”。会想写这样一个专栏，因为感受到社会变动得很快，快到让人家觉得来不及应付，好像总是必须仓促地做出许多决定来。很多人忙到没有时间去想想自己相信什么，基于什么理由做了自己生活上的决定。换句话说，谁有闲工夫去管什么观念不观念的呢？

正因为急，所以更需要回头把观念弄清楚。这是我不合时宜却坚持的选择。社会，尤其是复杂的社会，各种力量盘根错节、环环相扣，匆忙的决定往往只能看单一面向，无法仔细安排相关的变数

也就是大家习惯说的“配套”。眼光集中只看当前要看的，不管“配套”，“配套”跟不上，那是会酿成灾祸的。

既然是为了彰显社会的复杂性，所以才要根本

地谈观念，那么也就不能抽象、空洞地谈，要让观念回到现实的人的生活、人的经验里，保留所有不纯粹但真实具体的内容，这样的“观念”才不会变成另一种架空的答案。

“观念”不是答案，不能提供简单、现成的答案。“观念”毋宁比较接近问题，或说接近一种从问题中趋近答案的寻找过程。我们可以找到其他人曾经有过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寻找。所以我选择了用说故事的方式，来谈观念。这里的“故事”两字有两层相关但不全然相同的意思。一层指的是有情节的传奇，一段或长或短的人类特殊经验。另一层泛指“过去的事”，大大小小曾经发生的事，尤其是一些太小太琐碎而不会被纳入归类为“历史”的事。

这两种意义的“故事”，有共同的特色

把我们从现实生活带出去，让我们看到不同时

代不同社会别人的经验。故事扩大我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故事提供我们丰富多样性，打开我们的眼界。

用故事来呈现“观念”，我们也许有机会脱开现实的拘牵，反而能将现实看得更清楚。写着写着，我愈来愈感觉到，原本为了深度思考现实的用心，转变成了“为未来做准备”。故事所提供的庞大面向，加上观念所提供的深究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将未来看得更清楚，同时也烛照出从现在通往未来的路径。

如果我们稍有耐心、多点好奇，故事和“观念”，真的可以照亮未来。这是我的信念。

第一辑 国家为你做了什么？

“别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就是这句话，象征了美国爱国主义的最高潮，记录了有那么一段时间，短暂的

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人心甘情愿团结在国家旗帜下，为自己能身为美国一分子、对美国作出贡献，感到高兴且自豪。 [爱国]

一定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 (1)

1961年1月20日，约翰？

肯尼迪早餐吃了几条熏肉。那几条熏肉意义重大，倒不是熏肉本身有多好吃，而是这一天是星期五，罗马教廷规定天主教徒不准在耶稣基督受难的星期五吃肉，肯尼迪是天主教徒，他在星期五吃肉，却没有违背教廷的规定。

因为教宗保罗二十三世特准天主教徒在这一天吃肉，理由是：约翰？肯尼迪要在这一天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选上总统的天主教徒。

波士顿的枢机主教卡辛负责监誓。他致词时发现讲台后面冒出细细的一缕轻烟，他以为那是

意图谋杀肯尼迪的炸弹被点燃引信了，当下决定拖长致词，延迟肯尼迪上台时间，宁可让炸弹炸死自己。

还好没有炸弹爆炸，只是电线走火的小意外，当然卡辛主教也没有成为替肯尼迪而死的烈士，只是让在场很多人嫌他不识大体，又臭又长讲了一大堆而已。肯尼迪终于上台了，宣誓、就职，接着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

肯尼迪的演说，是历史上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第四短的，一共只有五十二个句子，不到一千四百字。不过没多久，这篇演说就凌驾于许多篇幅比较长的前辈，跃升为最有名的美国总统就职演说。

尤其是演说词里的一句话，不只在美国人人朗朗上口，其影响力还从美国蔓延出来，全世界大部分人透过各种不同翻译版本，读过或听过

这句话。 美国爱国主义的最高潮

“别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就是这句话，象征了美国爱国主义的最高潮，记录了有那么一段时间，短暂的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人心甘情愿团结在国家旗帜下，为自己能身为美国一分子、对美国作出贡献，感到高兴且自豪。

这句话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有其特殊历史背景条件。仔细看一下肯尼迪演说词当中其他五十一个句子，他在里面用了三次“自由”、十一次“新”、四次“时代”、三次“革命”和各种不同形式提到“世界”一共十四次。整篇讲稿只有一千四百字，也就是平均每一百个字中，就要讲一次“世界”。

相对地，一千四百字中，对美国内政几乎没有着墨，有人仔细算过真正讲美国国内情况的，

总共只有两个字。藏在一个宣示将坚决维护“国内及世界人权”的句子里。“国内”（at home）终于出现了，但还是和“世界”一起并列的。

这是一篇从头到尾讲国际局势的演说，因为那是冷战的高峰时期，美国人最关心的，是和苏联之间的对抗与竞争；美国人最恐惧的，是苏联的侵略野心和苏联为数庞大的核弹头。

在“别问国家”那个句子之前，肯尼迪讲的是：“漫长的世界历史中，只有少数几个时代被赋予了在最高度危险情况下卫护自由的角色我乐于接受这个角色。”从这样的上下文一路读来，我们明白了，肯尼迪给予美国人的，是一种面对恐惧、克服恐惧的勇气，将冷战视为卫护自由的“圣战”，视为某种天启天授的责任，而且指出来勇气的来源

大家团结、无私地以国家为单位来奋斗，就能有勇气，就能承担责任、克服困难。

难怪教宗要为了他就职特准天主教徒吃肉。至少在演说词中显现的，肯尼迪是个有信仰的人，而且他有很大的本事将信仰传递、感染给众多的人。

这样一句话，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也很受欢迎。连最强调民主自由的美国，都强调国家团结、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哪一个国家的领袖不逮住机会拿来对自己的国民大加宣传，加强大家为国家服务的热情，同时降低对国家，尤其是对政府的抱怨呢？ 对国家的工具性理解

不过，美国人高兴、自豪认同国家的时期很短暂，很快就结束了。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遇刺，大大震撼了美国人；更重要的，美国出兵越南，越战不只带来惨重伤亡，而且愈打愈

不知其所以然。为了越战，美国社会被严重撕裂了，支持越战的人和反对越战的人，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团结在一个“国家”里了。

吊诡的是，这样的巨大逆转变化，没有让肯尼[爱国]一定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2) 迪的就职演说被“抛入历史的垃圾桶里”，反而更加强了其长期烙刻入美国人记忆的力量。

那是一段难得“天真时光”的纪念遗物，美国人，而且是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还相信国家，相信可以抛开自己的私心奉献国家，“问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看起来不只在美国，而是全世界（或许朝鲜除外）的人都不可能再重返那样的“天真时光”了。过去十年内，美国新保守主义得势，然而新保守主义创造了美国单边主义的新霸权，他们对外的宣传中，基督教、上帝、传统家庭价

值、反恐怖主义、文明冲突等观念的重要性，都高于美国国家主义。更不必提小布什及新保守主义在美国，一直受到自由主义的强烈质疑、反抗，终于导致2008年麦凯恩大败，民主党提名的奥巴马赢得大选。

欧洲、日本、拉丁美洲，甚至在中国，今天或许还有可能叫大家“问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却不可能要他们“别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了。将近五十年间，国家的意识其实悄悄地、但明确挪移变化了。以国家作为信仰对象，相信人应该牺牲自我利益，屈从于国家需要之下，这种想法愈来愈难以被接受了。

取而代之的，是愈来愈普遍地对国家的一种工具性理解。国家提供许多一般人自己无法个别取得的方便、好处，因而我们需要国家；但倒过来，国家也应该以提供这些方便、好处，作

为其存在的价值以及与国民发生关系的基础。

我们当然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因为唯有弄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才有办法下定决心，相应于国家为我所做、所提供的服务，我能为国家做什么，我又愿意为国家做什么。

[选举] 有议题、有信念的选举(1)

1918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僵持中，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场群众聚会中，尤金·德柏斯（Eugene

Debs）对着底下大部分是劳工的群众说：“总是那些上层阶级在宣战，却总是由下层阶级真正上战场打仗！”

群众聚会结束后，德柏斯遭到逮捕，罪名是违犯了“唆使叛乱法”，依照前一年才通过的“唆使叛乱法”，德柏斯因阻碍动员被起诉，随后被法院判处长达十年的徒刑。

那一年德柏斯六十三岁，而且有病在身，没有人有把握他可以坐满十年监牢活着出狱。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给予德柏斯特赦，德柏斯却拒绝接受。战争结束前，威尔逊又特赦过德柏斯一次，德柏斯还是没有接受。战争结束了一年、两年，威尔逊总统一再颁布特赦，德柏斯却坚持继续待在牢里。一直到1921年，德柏斯才愿意接受总统特赦出狱，因为那个时候威尔逊已经卸任，换上了共和党的哈定担任总统。

德柏斯是谁？为什么前后两任总统都急切想把他从牢中放出来呢？又为什么他宁可忍受身体状况急速恶化的风险，就是不肯让威尔逊特赦他？

这得话说从头。德柏斯是个很有群众魅力的工运领袖，美国铁路工人工会就是在他手上成立

的。最早他支持民主党，还曾帮克里夫兰竞选总统。然而就在克里夫兰当总统时，德柏斯带领铁路工人罢工，抗议一家卧铺公司恶劣的工作条件，没想到总统竟然下令动用军队对付罢工工人，德柏斯还被抓到牢里待了半年。

德柏斯参选总统

这样的转折让德柏斯省悟，不能靠民主党来追求工人的福祉，于是他自己跳出来直接参与政治。1900年，美国社会党提名德柏斯竞选总统，他一共得到了十万票。1904年，德柏斯再度代表社会党出马，这回他的选票竟然比上次成长了三倍，拿下令人不敢小看的四十万票。四年后，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还是他，他再一次在大选中得到四十万票。

四十万票当然不足以选出一个社会党的总统，不过连续两次获得四十万票的表现却可以让美

国社会党成为一个具备基层实力的政党。1911年时，社会党在全美有四百五十个民选公职人员，包括五十六个市长和一个联邦众议员。靠这样的实力，美国社会党可以在各地一共发行五份日报和两百二十六份周刊。

1912年，总统大选又来了，社会党当然不会放弃竞选机会，提名的，还是德柏斯。这次选举，可热闹了。当时的总统塔夫脱争取连任，在自家共和党内却碰到前总统老罗斯福东山再起的挑战。老罗斯福气势如虹，在各州初选一路领先塔夫脱，甚至在自己的家乡俄亥俄州，塔夫脱都败给了老罗斯福。然而在关键的党代表大会上，党内大老控制的党代表票，却一面倒投给了塔夫脱。塔夫脱拿下两百三十五票，老罗斯福竟然只有十九票！靠这样明显的操作，塔夫脱惊险出线，老罗斯福咽不下这口气，宣

布成立自己的政党 进步党，参选到底。

民主党方面则是由出身南方，代表旧南方势力的威尔逊出马。再加上德柏斯，这四个人不只各具政治资历与政治魅力，更重要的，他们的政治主张构成了清楚却又复杂的交错网络。

各具立场的总统候选人

摆在四个人面前最大的问题，四个人都勇敢负责提出看法的，是美国资本势力何去何从。塔夫脱的背后，就是美国的大资本家，所以他认为政府别管太多，资本家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相对地，威尔逊认为政府应该有更大的权力，要拿联邦政府的权力打破大资本的建制与垄断，让中小企业有竞争的空间，那就是他的“新自由”政策。

老罗斯福同意威尔逊政府应该管、应该多管的态度，不过他对威尔逊希望让中小企业创造竞

争活力的看法，嗤之以鼻。他认为现代工业发展使得大企业成为必然趋势，所以政府最重要的使命，不是打击拆解大企业，而是订定严格规范看管大企业，让他们不得垄断、不能为非作歹。

至于德柏斯呢？他秉持社会党的立场，当然根本反对资本主 [选举]

有议题、有信念的选举(2)

义，权力应该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身上，创造一个超越阶级壁垒的平等社会。

选战结果，从选举人团票上看，威尔逊赢得压倒性大胜。他赢了四十州囊括四百三十五张选举人票，老罗斯福只拿下六州八十八票，塔夫脱更可怜，只赢了佛蒙特和犹他两个小州。不过如果看普选票，分布就平均多了。威尔逊六百三十万票，老罗斯福四百一十万票，塔夫脱

三百五十万票，共和党分裂效果明显，才让威尔逊渔翁得利。还有，德柏斯也取得了九十万票，比他四年前成绩又成长了超过一倍！

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选举，因为四个人都没有逃避真正的国家前途问题，他们都提出明确立场，而且各自立场都不一样，绝无浑水摸鱼、模棱两可的部分。威尔逊除了“新自由”之外，也在选举中提出让美国积极加入国际社会的主张，而他当选后，也的确按照这样的立场，在1917年让美国参战。为了应付战时需要，他才要求国会通过了“教唆叛乱法”对付战争异议者。

德柏斯连用革命手段创造工人天堂都不赞成，当然更反对战争。基于立场原则，他必定挑战威尔逊的战时法律，宁可因而被捕坐牢。威尔逊当然不能让一个参选过四次总统大选的人，

这样坐十年牢，所以反复颁布特赦，希望德柏斯出狱，而忠于原则的德柏斯却也一再拒绝，直到跟他在反战态度上较为一致的共和党上台，才愿意接受特赦。

别怀疑，不是所有选举都像我们这里的一样，没有真正的议题、更没有信念立场。1912年的美国大选就是很好的历史例证，告诉我们选举的混乱堕落，不是民主必然的现象，换句话说，别怪民主，应该要怪我们自己，要从自己的政治体制上去检讨，去寻找具有真正信念与关键议题的选举。 [政治家的教育]

培养更深更广的政治智慧(1)

罗马时代著名建筑师威特拉维斯（Marcus Vitruvius

Pollio），留下一本经典作品，叫《建筑师之书》。这部书第七册的序言里，威特拉维斯明白

定义如何衡量一个人身上最有价值东西的标准。他主张最简单的检验方式是，看哪一种东西在你遇到船难时能救你，能让你活下去。接着威特拉维斯讲了一个故事，描述一个罗马人在海上遇难漂流到陌生的罗得岛海岸，上岸后他如何凭借机巧与智慧，交到朋友、找到工作、累积财富，最终还赢得地位与尊重。

在这段故事后面，威特拉维斯写道：“所以我感谢父母让我受教育。”

他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凭借教育教给我们，内化在我们身体里的知识与能力，有朝一日就算不幸遇到海难，丧失了一切财物，到没有一个熟人的地方，我们还是能重新自立，取回被命运运作弄剥夺的一切。

因而在第七册里，他谈的都是建筑师的养成教育。依照他的规划，建筑师应该学画图、数学

、法律、医药、音乐、几何和天文学。换句话说，建筑师首先应该拥有完整的人的知识与能力，然后才从事建筑工作。

人的头脑是最精密的机械

威特拉维斯曾经担任过恺撒大帝的顾问，帮助他设计远征高卢时使用的大型武器。他对当时各种最先进的机械知识，有充分掌握。所以《建筑师之书》最后一册，第十册，讲的都是机械运用，战争时怎么用、平时又怎么用。然而在大谈特谈各种精巧战争最新武器发明后，威特拉维斯又讲了另一个关于罗德城的故事。罗德城被敌人团团围住。敌军在城内守军弓箭射程之外，日夜赶工造了一个巨型的攻城机。那个攻城机有轮子，上面高高架起好几层平台，每一层都配备了强力投石弓弩，而且攻城机最前方还有金属打造又硬又尖的长角。

攻城机即将造好了，一旦攻城机造好开过来，罗德城守军显然无力阻挡巨角的冲力破坏，也不可能躲得掉高高低低投石器投来的众多飞石，罗德城就要陷落了。就在攻城机启动的前一天晚上，罗德城内的一位建筑师将大家聚拢来，要求每一个人把家里尿壶里的大小便、洗碗洗澡洗衣服各种用过的水，愈脏的愈好，统统交上来。然后他从城里往外挖了一个小洞，将这些污水秽水往外倒在城下。

第二天，威武恐怖的攻城机出动了，发出隆隆巨响朝罗德城逼近。愈靠近罗德城，地上愈是布满了湿黏泥土和秽水的混合物。攻城机的轮子每转一圈，就沾黏上一堆污泥，愈沾愈多、愈沾愈多，而且轮子在泥巴里跟着愈陷愈深，攻城机刚进入罗德城守军弓箭射程内，攻城机的轮子完全陷死在泥巴里了。城上守军赶紧接

连放射燃烧的火箭，攻城机停在那里被烧成一副空架。

威特拉维斯评论：“就这样，最棒的机巧被建筑师的智慧拆解了。”

到头来，威特拉维斯的主张再清楚明白不过：最精密最了不起的机械，是人的头脑、人的心灵。一个毕生致力于为罗马设计攻城机器的专家，一个设计了许多气势磅礴的公共建筑的大师，对自己从事行业最终的结论还是回到人具备的思考与学习能力，而不是人已经学习、设计了什么；已经学习、设计了的东西，不管再怎么精巧了不起，都可能被新思考新发明的东西给拆解了。

威特拉维斯挑战强烈的“恒久”错觉。没有什么艺术作品比建筑更坚固更耐久，所以一位建筑师最容易想象自己的作品会长久一直站在那

里，成为一座永恒的杰作。威特拉维斯看透这种建筑的时间尺度，意识到所有已经造成了的东西都可能被拆解，未出现未完成的永远比已出现已完成的更重要。回到他提出的建筑师教育概念，我们就能理解，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和建筑没有直接关联的科目，其实是为了准备建筑师真正能建构出最精巧的机械与建筑

自己的心灵。现实的建筑知识与技术，只能帮建筑师盖现在的房子，却没办法让他想出拆解别人盖起的房子的对策，不能让他离开既有的条件，去盖未来的房子。 政治人才的养成

这是最清楚 [政治家的教育]

培养更深更广的政治智慧(2)

也最明白的道理，告诉我们为什么专家的教育养成，不能狭窄专注，而该宽广博大。尤其是政治人才的养成，更是如此。政治不能被视为

一门专门的学科，不能用政治学或法律知识培养政治人才。道理很简单：政治学与法律，是现实当下的知识，可是政治领袖，却必须面对各种未来变量。

光是等政治人才能培养到领袖层级，现实就已经变动不一样了。更何况众人之事集合累积的变量变化更多更快。国家的状况随时可能被从原有的轨道抛离开来，就像威特拉维斯反复讲的“海难”般的情境。没有以前既成的条件可供依循，那怎么办？

只好靠更深更广的知识与能力，一种综合性的智慧。这种智慧不可能从狭窄的专门训练中取得，必须更根本地理解世界事物之所以然，也就是回到哲学、文学、音乐，乃至医学、天文学的总和思考里。

很可惜，我们早已没有这种政治人物教育养成

的管道，甚至完全失去对如此培养政治人物的方法的向往。我们以为懂一点政治学，懂一点法律，会一点领导统驭，能演讲、能竞选，就足以担当政治领袖。这样的政治领导人，只具备处理现实的一点能力，却无法拆解现实、改革现实，也就无法想象、更不必说打造未来。到处都是这种等级的政治人物，我们也就只能在心中祈祷，不要碰到什么大变动，需要他们来应付不同的环境变化、不同的历史考验。

[下台的智慧] 重视步下政治舞台的身段(1)

喜欢战争史、军事史的人，一定知道美国的格兰特将军（Ulysses S.

Grant）。他是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最重要的统帅。南军中有充满领袖气质、传奇色彩与悲剧命运的李将军（Robert

Lee），北军的将领没有任何人可以在这几个方

面和李将军平起平坐，勉强要比，只能比军事、战略上的专业成就，那么格兰特就脱颖而出了。

格兰特与李将军同属一个时代，而且还曾在1846年的美墨战争中并肩作战。那是美国这个新兴国家，第一次以军事行动震撼了欧洲的成就。

美墨战争是场极难打的仗，欧洲人本来并不看好美军会赢，然而最后的结果却让他们大吃一惊。19世纪的世界霸主，建立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人，在颇负盛名的《卫报》上，如此评论这场战争：

美军的胜利，在历史上和亚历山大大帝横扫波斯、汉尼拔越过比利牛斯山、拿破仑跨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同一等级。美军中和拿破仑一般能干的将领，数以十计。

被《卫报》视为和拿破仑一般能干的将领中，

包括李将军和格兰特，然而当时谁也想不到他们两人十几年后竟然会成为战场上最可怕的死敌。

南北战争的前期，北军实际的领导者是林肯总统。在林肯自己指挥的阶段，北军打得很糟，林肯的经验及军事天分，差李将军太远了。他自己知道他需要既能拟定宏观战略布局又能确切执行战术细节的专才来协助，可是周遭能够运用的人，偏偏找不到可以同时见树又见林的。

。 格兰特获得重用

一直到关键性的威克斯堡（Vicksburg）战役。威克斯堡是密西西比河畔的大城，控制在南军的手里，北军很清楚，如果能把威克斯堡拿下来，就可以隔密西西比河将南军一切为二，在河东的南军部队将顿失奥援变得无足轻重。这个战略目标再明显不过，问题就在怎么打都打

不下威克斯堡来。

1863年夏天，攻打威克斯堡的任务从哈勒克（Holleck）将军手上交给了格兰特。格兰特设计了一套进攻策略，却立刻和远在华盛顿遥控的林肯总统起了冲突。最大的冲突点在于格兰特要把军队调离运补基地，全数开上野战区，林肯觉得太冒险了。格兰特坚持己见，不顾林肯的反对，对威克斯堡进行了全面的围城作战，结果逼南方守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终于投降。

消息传到华盛顿，林肯总统立刻发了一封信给格兰特，信的内容再白话、再明白不过了：“我愿意承认：你对了，我错了。”

能够这样白话、直接认错的总统真的不容易。认错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林肯将要重用这位胆大却心细的将领。1864年年初，林肯把格兰特召

到华盛顿，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地宣布将北军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交给格兰特。大家会感到惊讶，一方面是因为林肯竟然愿意释出大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格兰特的外表太平凡、出身又太贫微（从军前他是个连自己都喂不饱的穷店员）。不过如果他们知道格兰特接任总司令后所做的战略决定，会更惊讶。和在威克斯堡战役时一样，格兰特不愿保留任何兵力，要对南军展开全面的进攻。他把北军分散多头同时向南方进逼，如此迫使南方精锐部队无法集中，像李将军这样不世出的军事天才也只能在一地一隅指挥对抗北军，北军就可以在其他方位获得突破。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格兰特这次的大胆规划，林肯总统不仅全力支持，而且表示兴奋乐观。在策动这次总反击的过程，自然发展出一套新

的命令分工分权系统，总统是统帅，格兰特是总司令，哈勒克主管人事，另外一位史丹顿（Stanton）将军则以战争部部长的身份总管其他后勤供应。这套系统顺利运作，奠定了北军在战争后期节节胜利的基础。

熟读军事史、对战争史大有兴趣的人，却不一定知道格兰特除了是南北战争中的英雄之外，还是美国第十八任总统。他在1868年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获胜，1872年又当选连任。两次选举，格兰特挟战争英雄的气势都获得

[下台的智慧] 重视步下政治舞台的身段(2)

了压倒性的胜利。格兰特主政那八年，正是美国战后需要休息、需要和解的重要时期，以一个战胜方的总司令，竟然能够领导北方和南方重新结合，这种功绩，我们不应该忽略。

格兰特带领北军打赢战争、又以总统地位主导

战后复员，这样的人生历练应该可以让他在历史上和林肯并驾齐驱了吧？然而真正的历史评价却并非如此。

格兰特的名声一直只限于军事、战争方面，不像林肯被高高供奉为政治家的典范。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林肯有葛底斯堡演说，留下了让人永志难忘的伟大文献吗？我们别忘了，格兰特也是个有著作的人，而且他最重要的著作

他的《个人回忆录》，评价可高了。他的书被拿来和恺撒大帝的书相提并论；历史学家和评论家特别盛赞他在回忆中，能够摆脱一己的狭窄视角，不但精确掌握到复杂的事实，而且连对他的敌人 南军

也表示了公平的雍容大度以及高贵情操。这样的作品，在价值上也不输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

啊！ 格兰特和林肯的差异

再追究下去，我们只能说，格兰特和林肯的差别，恐怕不在于他们在政治与历史舞台上的表演，而在他们如何离开这个舞台。

林肯是在任内遭到暗杀结局的。这结局使他成了烈士，更增加了他的传奇意义，而且也替他免却了老化、交卸权力后的过程。至于格兰特呢？唉，那就说来话长了。

格兰特在1876年卸下总统职务，接着就从华盛顿迁居到纽约。在搬家之前，他的儿子小格兰特已经先到了纽约，而且开始在华尔街活动了。小格兰特原先念的是法律，然而却对做生意赚钱有着高度兴趣，只可惜他在这方面的天分不是太高，运气也不是顶好，进进出出并没有什么特别斩获。不过他拥有一项最特殊、最值钱的资产，那就是他的名字，名字背后代表的是

他爸爸的关系。于是难免就有各式各样的人环绕在他身边，帮他出主意、替他想办法。

这些人当中，和他来往最密切的，是一个叫瓦德（Ferdinand

Ward）的人。能说善道的瓦德说服了小格兰特和他一起合资开了一家证券投资公司，退休之后来到纽约的老格兰特，也在儿子的怂恿下，拿出钱来入股。

一旦有前总统（而且是甚受肯定爱戴的前总统）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可以想见会有许多人许多资金既放心又投机地涌入这家公司来。另外还有一个方便就是瓦德能够轻而易举地拿着格兰特的名号向银行借到钱。

瓦德以格兰特为招牌，告诉银行他名下的其他公司将会得到许多政府工程，其风险几乎等于零，而其利润则远超过平常。在这种情况下，

一位名叫费雪（James Fisher）的银行家上钩了，开始大量放款给瓦德的公司。

然而实际上，老格兰特是个相当正直的人，他根本不可能运用影响力去左右政府公家预算发包，瓦德在这方面毫无所获。再加上瓦德和小格兰特都算不上是精明的股票操作手，他们在股市的表现也不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账面上因为不断有新资金新贷款源源挹注而显得热闹滚滚，底下却是一个不定时炸弹正在坐大，不知什么时候会爆炸。

从账面上看，最漂亮的时刻，老格兰特坐拥两百万美金的身价，他儿子小格兰特财产也直逼百万美金。在1880年代，这样的数字大得吓人。不过虚胖的荣景当然维持不了太久。1884年，瓦德的投资连环失败，气球眼看就要吹破了

。在一切破灭之前，瓦德还再耍了格兰特一次。瓦德骗老格兰特说，公司营运的确是出了点问题，不过是被费雪的银行经营不善给拖累的，如果能够及时取得十五万美金的一笔新现金，公司就可以周转过来，一切都会没事。

为这十五万美元，老格兰特只好去找当时的美国首富、铁路大亨范德比尔（William Vanderbilt）。范德比尔在华尔街杀进杀出多少次，什么阵仗没见过，当然心知肚明瓦德在玩什么把戏。范德比尔把格兰特的公司狠狠地奚落了一顿，然后说：单纯卖格兰

[下台的智慧] 重视步下政治舞台的身段(3)

特前总统的面子，他还是愿意出借这十五万美元。没良心的瓦德拿到十五万美元竟然就逃了，公司一夕之间宣告破产。破产当天结算，公司资产只剩下六万七千多元，却负债一千六百

七十九万再加两千多元的零头。

破产那天，老格兰特很勇敢、很有格调地在公司待了一整天，面对所有的压力，没有退缩更没有逃避。当他离开时，包围在那里的人，不管多焦急多愤怒多难过，都还是举帽向这位解救过美国免于分裂瓦解的前总统致敬。

1884年6月，距离他卸任只有三年多，格兰特身上的存款不到两百元美金。更惨的应该是以他一生的时间努力建立起来的名声名誉，以同样快的速度流失破产。他几乎走投无路了。

成为作家的格兰特

格兰特一生在战场上、在政坛上度过，他从来都不曾以善于写作闻名。然而在山穷水尽的状况下，他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可以替自己替家人再赚一点钱，那就是写回忆录。

如果没有华尔街的惨败，格兰特不太可能为了

出版商愿意预付的两万五千元就同意写回忆录，这个世界上大概就会少掉一本难得的杰作。可是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撰写回忆录的工作压力，格兰特应该可以多活几年吧。祸福之间真是难以计算。

格兰特自始至终都是个负责的人。他尽职地完成了回忆录，把原稿交出去的三天之后，就溘然而逝了。享年只有六十三岁。差堪在坟前告慰格兰特在天之灵的，是他的回忆录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短时间内卖了三十万本，替他的家人赚进了五十万美金的版税。

格兰特意外成了一位作家、意外留下了一本杰作、意外赚了一大笔钱，然而他付出的代价却是失去了他本来在历史上应得的更崇高的地位、更明确的肯定。连带的，本来不只是美国人，美国以外全世界许多人都可以从格兰特的作

品中学到更多智能，却因为他受损的历史地位，他的书也没有传播到那么远、发挥那么大的影响力。

历史是很难假设的。可是假设格兰特没有这样在华尔街跌跤，假设林肯没有被暗杀，就事论事地比较他们两个人的所作所为，难道格兰特不应该比林肯还更伟大、更了不起些吗？

不过历史从来不是真正公平的。历史，让我再说一次，不只看你在舞台上演了什么，还要看你怎样步下舞台。有时候，步下舞台的身段比起舞台上的挥汗表演，还要更难。

[绝对真理] 没有人能掌握绝对真理(1)

在2009年1月20日离职的美国总统，常常被称为“小布什”。他年纪不小、体型不小，而且还扎扎实实当了八年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发动两场战争。为什么人们要叫他“小布什”？这

是为了要跟他爸爸，1989年到1993年也当过美国总统的另一个布什区分开来。一个“老布什”，一个“小布什”，才搞得清楚讲的到底是哪一个“布什总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老布什服役于美国海军，担任轰炸机驾驶员，他的飞机曾经被日本高射炮击中，飞机坠毁前，老布什及时跳伞，掉落海中，又幸运地找到了从飞机上弹出的救生艇，在救生艇上漂流后，被美国船舰救起。

1988年老布什竞选美国总统，这段经历当然要抬出来彰显他作为战争英雄的身份。接受访问时，有人问老布什：“爬上救生艇，漂流在茫茫大海上，你心里想什么？”

老布什回答：“我想起妈妈、爸爸，以及他们给予我的力量。想起上帝与信仰”停了一下，补充说，“还有政教分离”

有没有搞错？漂流海上生死未卜，竟然去想政教分离？战争当中，生命受到威胁的老布什当然不可能想什么政教分离，会有突如其来的这句话，是因为他讲到了“上帝”，自己立刻感到不安，怕违背了美国宪政精神上的政教分离原则，顾不得上下文，赶紧补上了这么一句消毒说明。

小布什没有上过战场。然而他就任总统的第一年，就遇上了“九一一事件”，2001年年底，他下令美军进攻本·拉登“基地组织”所在的阿富汗，接着2003年，他又发动了第二次波斯湾战争，攻打伊拉克。

伊拉克战争引起许多争议，国际几乎一面倒地反对，联合国也拒绝通过支持美国出兵的决议。回顾这些波折，《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华德问小布什：“你是否寻求父亲的看法与意见呢

？”小布什毫不迟疑：“不，在需要力量的关键时刻，我父亲不是那个对的父亲，我寻求的是更高的父亲的看法与意见。”

小布什的信仰之路

换句话说，要不要发动战争，他没有想到老布什，他想到的是上帝。他大刺刺就说了，而且没有同时想到“政教分离”。

对待宗教的态度，是老布什与小布什最大的差异。1988年老布什贵为现任副总统，出马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提名，初选第一仗，竟然就在爱荷华州摔了一跤，得票屈居第二，输给了罗伯逊。这位罗伯逊是何方神圣？他是具备牧师身份的电视布道家。尴尬面对投票结果的老布什，又讲了好笑的话，他解释自己落败的理由是：“支持者可能都去打高尔夫球或去看航空展了。”是啦，人家的支持者有宗教信仰做背

景，不会随便忘掉要参加初选。

相对地，2000年小布什选总统，虽然他的普选票总数比戈尔少了几十万张，然而在白人新教徒中，他囊括了百分之八十四的选票，再多电视布道家也不是他的对手。

事实上，八年任期中，小布什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电视布道家。每一个美国人都知道了他信仰上帝的过程。四十岁左右，他遭遇一连串的挫折，竞选联邦众议员失败，家族交给他经营的石油公司破产了。他开始酗酒，老婆下了最后通牒

不戒酒就离婚。在那样的非常情况下，他参加了一个读经班，读经班在每个星期一晚上聚会，那本来是小布什边喝酒边看美式足球赛转播的时间。他毅然牺牲了自己最喜爱的享受，在读经班里重新认识上帝，找回自己，戒了酒，

挽回了太太和女儿，然后，接过本来似乎要交给他弟弟的布什家政治棒子，生命道路大逆转。

而且，小布什多次在正式的演讲，包括国政咨文中，不只刻意引用《圣经》上的话，还把许多《圣经》中具有宗教意味的语词，偷渡放在里面，让常上教堂、常读《圣经》的人，从字里行间读到、听到不同的意义。

难怪他不向那个父亲寻求力量，因为那个父亲老布什大概会紧张兮兮地提醒他：“政教分离！”事实上，八年中，很多人用各种方式批判小布什的做法，明显违背了建 [绝对真理]

没有人能掌握绝对真理(2)

国元老而立宪精神，让宗教跨越界限，干预了政治。面对这样的批判，小布什最常祭出的护身符是：“我没有将自己的信仰用政治力强加

在别人身上啊！谁规定总统不能信上帝、不能引用《圣经》，林肯不也在他的就职演说词中讲到上帝吗？” 林肯与小布什的区别

没错，美国人都读过的林肯第二任就职演说词中，讲到了上帝。不过，他讲的是谦卑面对上帝，时时怀疑自己的决定，也就是上帝提醒了他要“戒慎恐惧”的意思。

这跟小布什引用上帝的态度，大大不同。小布什习惯做的，是拉上帝来为自己背书，将自己所要做的事

反恐、战争、冻结人权，甚至为富人减税，都包装成上帝的意旨，是不该被质疑的使命。

美国开国立宪的元老们，为什么特别要求政教分离？因为他们理解民主本质上是要在各种不同意见中寻求妥协统合，民主需要讨论、需要质疑。然而，宗教却刚好相反，宗教提供不容

怀疑，也不容讨论的信仰答案。

林肯的上帝，要他谦卑，要他假想自己可能有错，那样的上帝和民主没有冲突。小布什的上帝，却帮他充满自信、我行我素，那就掉入立宪元勋们努力想要避免的民主对立陷阱里去了。

也因此，不必等几十年后历史学家来写，我现在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从民主的标准上看，小布什的历史地位一定不会高的。不只是他，任何自认掌握绝对真理的人，不管那真理是上帝、是“台独”或统一，都不可能做好民主体制下的称职领导。

[生命权] 尊重生命的价值(1)

在2000年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小布什做了六年德州州长。六年之内，他一共签发了一百五十二件死刑执行案，不只是德州历史上，而且是2

0世纪以来全美国，将最多犯人处死的美国州长。

这项“成就”令人惊讶。尤其是考虑到那个时期，全美国、乃至全世界主要的潮流趋势，是积极要求废除死刑，或至少是对于死刑采取一种更谨慎、更小心的态度。欧洲大部分国家早就取消死刑了，美国也有一半以上的州立法废除死刑，就连台湾都对“治乱世用重典”有了不一样的看法。要不是1997年爆发了令人发指的“白晓燕命案”，台湾支持废除死刑的力量应该会更大吧！即使有像陈进兴那样穷凶极恶的罪犯，台湾这几年仍然大大减缓，乃至停止了签发死刑执行令。

德州州长布什还真是反其道而行啊！1999年竞选总统时，他出版了一本谈政治理念的书，他知道自己签发处决那么多犯人的纪录，一定会

引起注意与争议，因此特别在书中宣称：每一件死刑案送到他桌上，他都仔细考虑过各种因素，确认犯人的确有应该被处死的充分理由。不过在他当选总统之后，美国新闻界有人取得了德州州长的行程表，上面清清楚楚记载着，每一次有死刑处决令该要签发时，当时的德州检察长会准备好相关资料，在早上安排与布什州长半个小时的会议。

只有半个小时！布什所说的详尽仔细考虑，原来都只花了半个小时就做完了。一桩死刑案，从调查到审问到判决，有多少文件、多少证据，布什州长要如何在半小时中考虑衡量这些数据？

布什的解释是：法院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走过那么细密的程序，他所要问的只能是：有什么特别理由怀疑、不接受法院判决吗？在那半

小时会议中，州检察长要准备的资料，是整理那些反对法院判决的特别理由。

对生命缺乏基本的尊重

原来如此。照他这样的标准，那半小时的时间说不定都还嫌太长呢！毕竟一来，布什州长没有真正要了解案情来龙去脉，这个犯人被控什么罪名，因为什么证据证明了什么行为所以应该夺取他的生命。他要的，只是州检察长整理好告诉他这案子有没有什么蹊跷，如果检察长说没有，那他就认为没有，就可以安心签名了。

难怪他六年任内，一共有一百五十二个死刑犯执行令送到他桌上，他签了一百五十二件，没有一件例外，没有一件特赦，甚至没有一件判定延迟再议。

布什州长主张：这样的纪录显示他尊重法律、

尊重法院，不以个人的意志，不以州长的政治权力，介入法院判决，不干涉法律正常执行。不过换个角度，这样的纪录还显示出了其他意义。第一是他对于为什么至今美国州长仍然握有对州内每一个死刑犯的最后签决权，显然没有什么根本的认知与思考。法律管辖评断的是行为，然而让人做出行为来的，却有各式各样的动机，还有各式各样环境因素的影响。剥夺人的生命权，是法律的终极惩罚，在终极惩罚之前，动机及其他因素应该获得充分考虑，而州长就被赋予了进行这种“人的考虑”的权力与责任。

另一层相关的意义是：显然布什对于人命，尤其是他心目当中的“罪犯”的生命，缺乏根本的尊重。和其他主张保留、甚至多用死刑的保守人士一样，布什也喜欢强调一般人的生命权

、受害者的权利，来合理化对于重犯者的死刑惩罚。也就是说，国家、公权力大可以决定取走“罪犯”的生命。这样的思考中，没有一种对生命普遍的尊贵，也就没有保护生命的基本底线。

生命是可以分类、甚至应该分类的。被归纳进不一样、“不对”的类别里的生命，就不受保护，甚至可以理所当然予以消灭的。

不令人意外的伊拉克战争

这样一位毫不手软签决一百五十二名死刑犯，没有任何兴趣想知道他们犯罪过程的人间故事，更绝不愿理解案情相关动机、社会因素的州长，当他成了总统，他会发动伊拉克战争，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伊拉克战争最大的特色，多年之后大家应该可
[生命权] 尊重生命的价值(2)

以看清楚了，是极其草率鲁莽的决策过程。从来没有坚实证据显示萨达姆政权与本·拉登“基地”组织有任何关系；从来没有坚实证据显示萨达姆握有大型毁灭性武器，布什总统还是一意孤行发动战争。

当时的美军三军联席会议主席明确在国会表示：要打伊拉克战争，尤其是要在战后有效控制治理伊拉克，需要“数十万大军”。布什却放任他的亲信，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这样的估算嗤之以鼻，主观任性地以十万军队就进行了对伊拉克的侵略占领。

结果，军事行动很容易打进巴格达，很容易赶走萨达姆，然而接下来人员不够、缺乏训练，一连串因素使得美军无法有效管理伊拉克。到处都有游击队蜂起，以各种临时自制的武器袭击美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当然，在这过程中，伊拉克人，不管是原来的军人或平民百姓，伤亡数字更是美军的好几倍、几十倍。这些都是人命。

偏偏这些不是布什总统认为应该要珍惜、应该要尊重的生命。如果体恤、珍视生命，“九一一事件”之后立即进行的阿富汗战争还没打完，他不会执意非打伊拉克不可。至少不会用那么少的兵力、那么缺乏训练的军队去占领伊拉克。

如果布什总统，不，如果布什州长能够懂得尊重生命，尊重人最基本的生命权的话，美国应该可以免去一场愚蠢、粗鲁、代价极高的战争。

在政治上，如果不能培养、建立重视生命权的价值观，那么犯下的错误，往往是最严重、最可怕的错误。 第二辑 找到自己的风格

约翰·穆勒的爸爸，是在英国社会享有令誉的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老穆勒很强悍很霸道，尤其在教育儿子一事上。在父亲的规划下，小穆勒三岁就开始学希腊文，七岁学拉丁文，十二岁学数理逻辑。更重要的，老穆勒早早就选定了小穆勒最主要的智识导师

主张“功利主义”、主张人生目的就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边沁。

小穆勒在父亲的看管、指导下，度过了紧张、痛苦的二十年。二十岁那一年，他终于精神崩溃，作为对父亲最无奈、也最直接的抗议。

[基本价值] 基本价值的分歧很难并存共处(1)

英国大文豪卡莱尔（Thomas Carlyle）有一部传世的重要作品，叫《英雄与英雄崇拜》，那是他在1840年代一系列演讲的

讲稿汇编。系列演讲很受欢迎，吸引了许多英国名流买票入场聆听。

其中有一场讲的是“宗教英雄”，“崇拜”的主要对象是伊斯兰的创教先知穆罕默德。讲到一半，卡莱尔拿前辈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及其信徒来做比较，以近乎不屑的口吻表示，关于人及其命运的看法，穆罕默德比边沁高明太多了。

当时在听众当中，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抗议地说：“不！”随即走出会场。在场很多人认识那个走出去的人，是另一位重要的英国思想家，写了《论自由》的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很多人当下理解了穆勒抗议出走的原因：他曾经是边沁重要的信徒、弟子。

约翰·穆勒的爸爸，是在英国社会享有令誉的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老穆勒很强悍很霸道，尤其在教育儿子一事上。在父亲的规划下，小穆勒三岁就开始学希腊文，七岁学拉丁文，十二岁学数理逻辑。更重要的，老穆勒早早就选定了小穆勒最主要的智识导师

主张“功利主义”、主张人生目的就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边沁。

小穆勒在父亲的看管、指导下，度过了紧张、痛苦的二十年。二十岁那一年，他终于精神崩溃，作为对父亲最无奈、也最直接的抗议。

精神崩溃之后，边沁的哲学显然对小穆勒失去了说服力，一个甚至无法确保自己的精神健康、无法追求一己幸福的人，谈什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呢？穆勒对浪漫主义的转向小穆勒转而大量阅读浪漫主义的诗篇。慢慢地总算从贫弱的精神状态中恢复，艰难地重拾了

理性思考的习惯。这段经验，一方面让他理解到“自由”的重要，埋下了后来写《论自由》的初始种子；另一方面也让他找出了自己未来生命的目标

他要将浪漫主义中挖掘出的种种热情与神秘经验，转译成理性的语言，让更多人能够了解。

这段过程之后，边沁及其哲学，成了小穆勒身上深刻的伤痕，难怪他会在卡莱尔演讲的会场失控站起来离开。

小穆勒的反应可以理解，然而对很多人来说，卡莱尔的行为就没那么容易理解了。卡莱尔明知约翰·穆勒和他太太就在演讲会的观众席中，他甚至知道穆勒太太买了全系列每一场演讲的入场券，更关键的是，没有人比卡莱尔更了解穆勒和边沁的关系，尤其是边沁在穆勒生命中所代表的痛苦记忆。

卡莱尔比约翰·穆勒整整大十岁，两人相识时，卡莱尔三十五岁、穆勒二十五岁。使得两人一见如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穆勒正处于和父亲的紧张关系中，而卡莱尔也有一个严厉、凶悍的爸爸，那一年他爸爸突然去世，卡莱尔也陷入特殊的父子心理问题中。

最鼓励穆勒接触浪漫主义的人，就是卡莱尔，穆勒自我疗伤的过程中，通信最勤、最亲密的对象，也是卡莱尔。

卡莱尔帮助过穆勒，穆勒对卡莱尔的帮助更多。卡莱尔的著作在伦敦找不到出版商，黯然回到苏格兰乡下隐居，是穆勒反复劝说，把他再次劝到伦敦。卡莱尔在英国奠定文名最重要的作品，是《法国大革命史》，那本来是穆勒想要写的书。穆勒不只把题目让给了卡莱尔，还慷慨提供了自己收藏的数据与书籍。

卡莱尔完成《法国大革命史》后，还没出版前，穆勒就先写了一篇掷地有声的评文。文中盛赞卡莱尔的著作是近年少见的伟大作品，是一部史诗，势必影响往后英国所有的历史写作。穆勒自己承认：抢先写评文，是为了阻止“小鼻子小眼睛的评家”随便攻击《法国大革命史》，而且他的重量级评文也的确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大有助于卡莱尔作品的成功。

卡莱尔与穆勒的决裂

两个这样关系的人，为什么会在公开演讲会场发生那样尴尬的事？根本的理由，还是要在穆勒为《法国大革命史》写的评文里去找。穆勒对于卡莱 [基本价值]

基本价值的分歧很难并存共处(2)

尔处理“群众”的态度，有所保留。卡莱尔不相信群众，认为群众不可能扮演真正推动历史

的角色。他在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里看到的，是个人的智慧与决心。卡莱尔否定有什么样的理性系统可以控制革命的血腥冲动，唯一使革命得以有所建树的，是英雄、是伟大的个人领袖。

相反地，穆勒寄希望于代议制政府，如果革命后不能建立代议制政府，那么“舆论上任何重大争议都将导致内战”。

两位曾经再亲近再要好不过的朋友，在这点政治立场上有着明确分歧。这点分歧终究使得他们无法继续维持那样的友谊关系了。太多事情都会触动这条神经，提醒、乃至扩大了他们的差异。例如1865年英国殖民地牙买加工人叛变，杀害了十八位政府公务员。牙买加总督动员军队镇压，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处死了四百二十九名牙买加人。一群知识分子与士绅

联署谴责牙买加总督的行为，领衔的是穆勒；同一时间另一群知识分子和士绅联署声援牙买加总督，带头的是卡莱尔。

1873年，穆勒早于卡莱尔去世。卡莱尔听到穆勒死讯，感慨地说：“很多次我都想写信给他，问他：

约翰·穆勒，到底是什么因素将我们分隔开来呢？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穆勒地下有知，听到卡莱尔这样问，或许会回答：“是最基本的政治立场分隔了我们。”很多不同立场的人能继续做朋友，可是在政治上相信个人英雄主义，与相信群众政府系统，这两种态度却很难并存共处。这是最残酷的事实。这两种态度，是政治态度，却又不只是政治态度，而是会影响个人几乎所有是非判断的根本价值，就连卡莱尔与穆勒都通不过这种差异

的考验。

其实，感慨地说着“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时的卡莱尔，心底又何尝真正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因素隔开了他和穆勒呢？ [历史]

了解真正的人间变化(1) 哥伦布为什么伟大？

“正统”的解答，我们会从历史课本里得到的解答，应该是：他不受自己那个时代的迷信所拘执，坚持认定地球是圆的，所以就能找到一条向西走却到达东方的航路，而且他勇敢地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现，终于发现了美洲大陆。

不过如果稍后深入查考出土的原始史料，简单的“正统”解释，会需要蛮多附注说明的。例如：哥伦布阅读《马可波罗游记》，完全相信游记里所描述、形容的那个华丽、丰饶的东土，深深迷恋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与日本，所以才立志要找到一条比较方便能够去到远东的航

路。

哥伦布一生四度西航，每次都在今天的美洲大陆登岸，可是不管别的航海家、制图者如何说明，他始终坚信自己已经到了亚洲。虽然发现了“新大陆”，然而直到去世，哥伦布没有察觉这块大陆之“新”，他认定自己的成就，是找到新的路径到了古老中国所在的“旧大陆”。

他为什么如此“铁齿”？因为他实在不是个太好的航海家，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航海家。与“正统”的解释相反，15世纪末期欧洲出现了专业航海、制图圈，在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家都确认地球是圆的，换句话说，大家早想到、也都同意，由欧洲出海向西航行，是可以绕着地球到达东方去的。理论上知其存在，却没有人起航去证实，理由是：这条航路太遥远了，

超过当时航海技术的限制。

误打误撞的哥伦布

那为什么哥伦布敢去？因为他的地理计算太差了。当时一般欧洲地理相信：欧亚大陆横贯占据地球球面的一百八十度（事实上只有大约一百二十度），如果要从欧洲最西边出发，向西到达亚洲的最东边，就要航行地球一半（一百八十度）的距离。这个距离，不可能是当时只有八十英尺长的远洋船所能负担的。

哥伦布却不接受别人通行的看法。他主张：从《马可波罗游记》可以推断出日本在中国东方三十度。再来，如果不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而是从加纳利群岛出发的话，航程又可以再减九度。他又自作主张认定原本对欧亚大陆面积估计太小，最后算出来，只要航行六十度，地球圆周的六分之一，就能够从欧洲去到日本。

然后他还混淆了英里和海里的长度，东算西算，认为只需航行两千七百英里就够了。今天我们确切量出来的距离，从加纳利到日本最东缘，是一万三千英里！

抱持着错误的信心，哥伦布才敢出发，也才争取到西班牙王室的支持。航程很远，哥伦布船上船员很恐慌，一直看不到陆地让他们心生恐惧，甚至开始怀疑船会不会航行到世界的尽头，“咻”地就跌入无底深渊里去。哥伦布为了安慰其他船员，特别搞了两本航海日志，一本放在外面，大家都可以去翻，另外一本私藏在船长室里，只有他能看。外面那本日志上，哥伦布刻意写“假”的航程距离，大概只有写在私密日志上“真”的距离的一半，这样船员们就不会觉得：怎么走了那么远，都没看到一片陆地呢？陆地在哪里？

用这种方式欺骗船员，蛮聪明的，只是后世计算发现，其实哥伦布误以为的“假”的航程距离，远比私藏的“真”的航程距离接近事实。

“假”才是“真”，“真”反而是“假”啊！会搞这种乌龙，因为哥伦布根本无法正确使用当时最先进的仪器，他连在陆地上都测不准自己的所在位置。例如说，他去到古巴时，测出来的纬度是北纬四十二度，拜托，北纬四十二度已经比纽约还北了！

老实说，哥伦布的成就，只有一个诀窍，那就是“误打误撞”。他绝不是像“正统”解释那样天纵英明、走在时代前端发现真理。当大部分航海家和地理学家都相信地球是圆形时，哥伦布在航程中，竟然还自以为发现了“地球的乳房”。在今天的委内瑞拉附近，他觉得海水隆起，北极星看起来偏离了位置。他相信航行

到“乳房”顶点后，船会接着滑下来朝地球的肚脐眼去，而那里，应该就是想象中“天堂”藏着的地方了！

那个时代的欧洲航海家、地理学家，以为北半球就只 [历史] 了解真正的人间变化(2)

有一块欧亚大陆，没人想象到欧亚大陆的背面，还有美洲大陆。哥伦布真正的贡献，是发现了美洲大陆，矫正了错误的观念。可惜的是，哥伦布却从来没被自己的发现说服，继续坚持自己已经到了东方、到了日本或中国或印度的东缘，他的发现改变了整个世界，偏偏就是没有改变他自己。 历史并不那么有条理

这样一个人，抱持着多种错误的概念，懵懂地误撞出了历史的新页。几百年后，等他所制造出来的局面尘埃落定了，后人回头去书写他的事迹，却将他改写成了一个聪明、勇敢、冷静

、执著的人。

真正的人间，往往是混乱、复杂、带点盲目冲动而产生变化的。但这样的人间，一旦被写成历史，就被改造得有条理有秩序，还有许多先知与英雄。历史课本之不可信，就在于那是历史最简化的形式，而简化的规律公式，几乎无可避免地排除混乱、复杂、误打误撞的因素，凸显不真实的少数先知英雄智慧。

明明最不聪明、脑袋一塌糊涂，会把古巴搬到纽约北边去的哥伦布，竟然也就在历史课本里被神化为智者了。类似这样的过程，以前也出现在我们的“革命史”叙述中。乱成一团，从不同角度出发的晚清社会骚动，最后却成了国父孙中山的睿智安排领导。历史之扭曲，莫此为甚，莫此为甚。类似这样的过程，现在也开始被运用在“重写台湾民主史”上了。历史课

本开始叙述台湾民主化过程，无可避免地就意味着那本来骚动、多元、混乱、误打误撞的生命力，现在要被收编整理成单线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总体叙述了。而且是用后来民主化的结果，回头改造改写其过程的意义。

真正关心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的人，都应该抗拒这种“历史课本化”的扭曲叙述。该是怎样的哥伦布，还他怎样的面貌；该是怎样的台湾民主，也请还它本来的模样吧！ [怀旧]

怀旧与怀旧政治(1)

台湾的家长，大概不外两种。一种希望给小孩“对的童年”，另一种希望给小孩“快乐的童年”。“对的童年”，就是把握时机拼命学习，以求尽早领先别人。这种小孩的生活被排得满满的，要上学要写功课，还要补英文补码学补作文补舞蹈

的确，这样的童年，大概快乐不到哪里去。

主张应该给小孩“快乐童年”的家长，多少有点看不惯、甚至看不起“对的童年”那一派。

他们强调“童年只有一次”，不想给孩子任何压力，要送他们去森林小学，只能接受“启发教育”，而且要对小孩轻声细语，不能有一点强迫或压抑。

“干吗不让孩子快乐？”这派家长习惯理直气壮地问。是啊，这样教小孩，小孩是会快乐得多。然而人类至今还没有办法设计出完美的，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教育方法，度过“快乐童年”长大的人，难免也要承受“快乐童年”带来的后遗症。

西方发展心理学就探讨过“快乐童年征候群”

。“快乐童年征候群”是起源于“快乐童年”

毕竟要结束。曾经有过“快乐童年”的人，一

旦开始被迫要独立长大，开始有了生活上的种种压力，就会无可避免地怀念起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

童年无法再来，童年快乐记忆却挥之不去，“征候群”于是主要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空虚与失落。每一个新的日子，对受困于“快乐童年征候群”的人而言，不是新鲜经验的累积，不是新鲜机会的开展，而是一次次痛苦的失落袭击。和那记忆的童年快乐相比，现实多么贫乏！现实的每一个日子，和过去对照而彰显其“匮乏”的本质，残酷地提醒着童年不再的事实。

愈来愈鲜明的童年记忆

这种人的时间中的主客关系，和别人相反。一般人会因为现实的刺激蜂拥而来，逐渐淡忘了对过去的记忆。愈近的现实，在成长意识里愈重要，愈久之前的记忆就不断被推到意识的边

缘去，愈来愈模糊黯淡。活在“快乐童年征候群”里的人，却是愈活记忆愈重要、愈鲜明。现实中的任何痛苦，都让他追想起童年的快乐，让那快乐更鲜明。就算现实中有什么快乐，也都还是引发他童年同类快乐的记忆，现实快乐成了童年快乐记忆的抄袭仿制品，他真正享受的不是现实中的快乐，而是现实快乐挑激起的童年快乐记忆。

现实与记忆的反复对比映照，终致使得童年“纯粹化”，变成一切快乐的具体聚集。任何现实里的痛苦，都能在童年记忆中找到安慰与治疗；任何现实里的快乐，也都能唤起童年记忆里更巨大、更“纯粹”的快乐。记忆非但不会褪色不会消逝，还会愈来愈清楚、愈来愈重要。那么清楚、那么重要的记忆，慢慢也就分不清楚哪些是真的从童年经验传留下来，哪些是

后来陆续自我演绎、想象富丽的了。

活在这种状况里的人，会随着现实而改变其记忆。因为记忆才是他们生命的本体，他们总是诉诸记忆才能处理现实经验。对他们而言，现实是失落，现实给他怎样的不愉快，他就会转而在过去记忆里寻求补偿。

例如说，现实里的贫穷，会引发他“记得”童年的富裕。现实里如果不得人缘、遭到排挤，他就会“记得”童年时周围的每个人都多么喜欢他，将他当作宝贝。如果现实里求取不到暗恋的人青睐，他就“记得”小时候怎样挥霍、甚至辜负别人对他的爱。

活在记忆中的普鲁斯特

历史上最有名的“快乐童年征候群”表现，首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吧！普鲁斯特将自己关在房子里，借由写作同时将自己关在

记忆中，巨细靡遗地召唤、记录童年的种种。有人质疑他怎么可能有那么好的记忆力，不过这种质疑实在是搞错方向了，像普鲁斯特这种人，记忆就是存在、记忆就是一切，他真正活在记忆中，也只能活在记忆中。

《追忆似水年华》书中，普鲁斯特不只记忆，而且记忆过去的记忆、记忆关于记忆的记忆，分析探讨记忆，记忆分析探讨记忆的记忆，层次之多之复杂之细腻，令人叹为观止。

《追忆似水年华》因而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怀旧
旧 [怀旧] 怀旧与怀旧政治(2)

文学成就。怀旧，nostalgia这个字拆开来看，指的就是“关于过去的痛苦”，或“因过去而带来的痛苦”。的确，尽管普鲁斯特记载了那么多童年往事的快乐，然而潜伏在叙述底层，毕竟永远有着那抛掷不去的痛苦，失落的痛苦。

当快乐变成记忆，也就意味着快乐的失落；而当记忆成为生活最重要的快乐来源，也就意味着人无法从现实、当下体验快乐了。

阅读《追忆似水年华》，让我们惊异于人的记忆世界，原来可以丰富到这种地步，然而却也让我们庆幸，还好大部分的我们，都有一定程度的现实可供立足依恃，不可能也不需像普鲁斯特那般，靠着拥抱、剪裁乃至吮食记忆，才有办法活下去。

阅读《追忆似水年华》，探索个人的怀旧情绪，还应该让我们思索：那么在社会、集体的层次上，记忆又如何产生、如何消逝、如何再制、如何浮显、如何变形？

在我们这个社会上，不是也有不少人以不同形式，展现出集体的“快乐童年征候群”迹象吗？有一群人，他们的“快乐童年”是日本殖民

时代，他们一直借由建构一套日本殖民时代记忆，来抗拒汹涌来袭的现实挫折。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对他们而言，正是失落的开始。

现在不也有另外一群人，以国民党时代为其不可复归的“快乐童年”吗？他们想起那个时代的经济奇迹、治安平静、风俗朴实，对照了现实的种种不堪。对这些人而言，政党轮替才是失落的源头。我们有“失忆”与“失忆政治”，另外这个社会还有“怀旧”与“怀旧政治”。怀旧中的痛与乐，有时候或许比谁当“总统”谁当主席，更关乎台湾政治往哪里走、演化成什么样的权力结构呢！ [记忆]

记忆是神圣的公民权利(1)

“温斯顿无法明确地记得：自己的国家有什么时候不在打仗。不过他小时候应该曾经有过一段和平期吧！在他最早的记忆里，留下了一个

印象：一次突如其来的空袭，周遭的人都觉得很惊讶。显然那是战争的开场。从那时起，战争真的就从来不曾中断过，尽管严格说来，那不是同一场战争。小时候，连伦敦都有过一场混乱的街道巷战，让他记忆深刻。然而想要把战争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什么时间跟什么国家打仗，却完全不可能。没有文字记录、没有口语记录，提及除了当前状态外，从前的事。在1984年这个当下，大洋国跟欧亚国打仗，跟东亚国联盟。

温斯顿清楚记得：才四年前，大洋国是跟东亚国打仗、跟欧亚国联盟。然而这只是他脑中刚好没有完全被控制的一小块片段记忆。官方说法里从来不存在任何改变。大洋国正在跟欧亚国打仗，所以大洋国就总是跟欧亚国打仗。当前的敌人总是代表绝对的邪恶，因而无论过去

或未来，跟那个国家和解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是乔治·奥威尔名著《一九八四》中的一段鲜活描述，关于国家控制最核心最根本的做法控制记忆。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在1948年写的未来小说。在那个时间点上，奥威尔察觉到：对世界秩序乃至人类文明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刚刚结束、夺走了成千上万的生命、毁坏了众多城市的大战争，而是方兴未艾、正要全面发展的苏联式极权主义。所以他运用想象力，刻画了一个未来世界，如果苏联的极权主义得以发展完成，人类社会可能变成的模样。

《一九八四》当然是一部优秀的反对极权主义的代表作。首先，我们应该体会、佩服奥威尔的洞见。在那个战争经验尚未远离的年代，他没有活在战争好不容易结束的安心和轻松中，

却能够敏锐地察觉：有比战争更可怕的东西正在酝酿，或者说，如果极权主义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未来人类将坠入不断战争的悲惨深渊里。

其次，奥威尔看清楚了极权主义最可怕的地方不在其意识形态，而在其统治手段。极权统治手段中最可怕的，不是暴力威吓，而是对于真理的掌控与扭曲。在对于真理的掌控与扭曲中，最可怕的又是对于记忆的改造。

个人记忆不可侵犯

不让人拥有记忆，否定记忆的有效性、否认个人记忆的权利，是扭曲真理最极端的做法。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曾经经历什么，有过怎样的过去，都必须听从、接受政党给予的标准答案，那他又怎么可能坚持自己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更不必说要在抽象、不可见不可听的知

识上挑战政党的权威了。

用这种方式分析苏联极权主义，《一九八四》也就成了不只是批判苏联的作品。事实上，类似的手段也的确被用来灌输其他“真理”。《一九八四》里昭示的一个重点，值得我们多年后持续提醒注意。那就是对抗极权、避免社会往集体极权沦落的根本力量，在于记忆，尤其是个人记忆的不可侵犯性。

人生来并未被赋予完美的记忆能力，记忆会有疏漏，也常因时间而有扭曲变形。国家就是利用人类记忆的这种本质匮乏，强势介入取消个人记忆的有效性，进而强势灌输“正确”记忆，取代个人“有瑕疵”的记忆。

要防止这种侵犯，唯一的方式，就是：在承认个人记忆不完整、不完美的情况下，依然保证个人记忆不受侵犯的基本权利。是的，人有记

错事实的权利，但人有不接受“正确”记忆的权利。如果在这上面退让，允许某种更高权威强制改变记忆，极权必然于焉形成。虽然每个人的记忆都不完美、不完整，不过在一个社会里，不同的记忆会彼此抵消错误，并产生互相补足缺漏的效果。所有不完美、不完整加在一起，总会浮现出一条基本事实骨干来的。

比对彼此记忆的机制

所以，与个人记忆权相应配套的，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要建立让人们可以集合记忆、自由交换记忆，进而比对记忆、发掘错误的机制。

图书馆，或任何聚集时效性资料的机构，都是这套机制 [记忆] 记忆是神圣的公民权利(2) 中重要的一环。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政府档案的搜集。然而要发挥帮忙提供“记忆对证”，这些数据必须要有充分的开放性。人们能够、而

且养成习惯，经常寻求这些固定不变的资料来协助、检验个人记忆，修掉不符、错误的部分。

另外媒体也是动态记忆平衡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表面上媒体报道当下、现实发生的事，然而在一个健全民主社会里，媒体担负着更深层的责任

那就是提供对照了解新闻现实的背景记忆。

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可以个别、孤立地认知现实事件，但是要将不同事件串接看出其变化与意义，却有赖于有效叫唤出记忆与纪录，才有办法做到。这就是媒体应该具备的专业能力与工作伦理。

有记录、有不断挖掘纪录来解释其变化与意义的专业，才能提供个人记忆更大的空间与保障。每个人保存自己的记忆，而记忆中的缺失与

错误，可以经常和动态检验过的公共记忆对照修正，于是个人记忆也就不至于错误、离谱到哪里去了。

记忆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一个社会的公民拥有多大的自我记忆权利，也就决定了他们共组的社会，能够给予成员多少、多宽广的自由。

[身份] 坚持决定自我身份的权利(1)

捷克小说家韦尔（Jiri

Weil）写过一本描述德国纳粹占领捷克时期的作品，小说一开头讲述一个纳粹亲卫队的队员，得到指令，要将布拉格音乐学院屋顶上一整排的音乐家塑像，“清除有害因素”，意思是打掉里面有犹太血统的人的雕像。亲卫队员不好意思地去请教学院教授，屋顶上一排雕像中，哪个是有犹太血统的？教授很明确地回答：

“门德尔松。”那门德尔松的雕像当然不能再

留在屋顶上了。可是爬到屋顶上一看，问题又来了，雕像上面没写名字，怎么晓得哪个是门德尔松？

亲卫队员不好意思再去问人家了，他运用纳粹知识中教导来辨认犹太人的重要方法，反复端详雕像的鼻子，找出其中一座鼻子最大的，“就是他！”抡起铁锤将雕像打个稀巴烂。完成任务后，回头却看见底下聚集了好多人，音乐学院的院长正赶过来，聚集的学生们一看见院长就急忙地说：“就是他！就是这个人毁坏了瓦格纳的雕像！”

这还真不是个小错误。奉命“清除有害因素”，这位老兄搞半天却将德国纳粹奉在神坛上、希特勒私人最崇拜的对象瓦格纳给除掉了。他这下子吃不完兜着走了。更尴尬的是，他之所以犯错，是他深信纳粹宣传，相信从犹太人的

外表就不只可以辨识他们的种族血缘，而且可以辨识他们的“邪恶本质”。在他眼里，瓦格纳明明就比门德尔松更犹太、更邪恶。

不信犹太教的犹太人

门德尔松是犹太人，但他是个奇怪的犹太人，有犹太血统，却不信犹太教。事实上，门德尔松自己在作品上签名时，签下的姓，都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门德尔松”，而是“门德尔松巴托第”，这才是他认定自己的全名。“巴托第”是门德尔松的爸爸在放弃犹太教，改宗信仰基督教，受洗后给自己家族加上的姓，理由是“门德尔松”这个姓，是个不折不扣纯粹的犹太姓。这个姓和犹太人关系太密切了，“要人家接受基督徒门德尔松，就像要人家相信有犹太教孔夫子一样荒唐”。门德尔松的爸爸如是解释为什么要加上“巴托第”的理由。

不过门德尔松的爸爸正式文书上加了“巴托第”，平常却不太用这个附加姓氏。要到门德尔松，才每次签名都不忘记加上“巴托第”，换句话说，门德尔松比他的爸爸更自觉地投身加入基督教的阵营，而与自己的犹太出身保持距离。

这样的选择，可以理解。毕竟那是欧洲反犹太主义盛行的年代，很多基督徒相信犹太后裔背负杀死耶稣基督的大罪，除非改信基督教，否则灵魂里永远带着魔性，不但死后会下地狱，就连生时也应该被以对待邪恶的方法予以孤立、惩罚。不愿受到反犹太主义歧视、迫害的犹太人，当然只好放弃犹太身份，转而认同基督教了。

门德尔松写过好几部宗教剧。其中有一部是取材自《圣经·新约》的《圣保罗》。《圣保罗》

的神剧情节里牵涉犹太人，在两个不同的歌词版本中，门德尔松选择了对犹太人更不友善，把犹太人刻画得更丑陋的那一个。

许多迹象都显示，门德尔松是真心认同以基督新教为信仰骨干的德国文化。至少他对德国文化的认同程度，远高于犹太的血缘关系。

然而这样一位以其成就，大大丰富了德国文化内容的音乐家，到了20世纪，却还是被纳粹以其血缘因素，刻意忽略、贬抑他的地位，认为和瓦格纳或布鲁克纳等“纯种”雅利安音乐家相比，门德尔松的音乐不够雄浑伟大，充满了小市镇小商人的气息，进而把他的音乐排除在主流之外。

门德尔松的新面貌

这样的情况，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戏剧性的改变。纳粹垮台，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曝光，刺激了幸存犹太人的同仇敌忾意识，与自

尊自重的运动。他们强调犹太人对世界文明曾经有过的丰富贡献，自我肯定作为犹太人的骄傲。

在这种浪潮中，门德尔松又被点名了，这时却被放在犹太音乐家的系谱中彰显出来。犹太史家写了传记，要赋予门德尔松“新面貌”。书里强调十岁时门德尔松亲历了1819的犹太[身份]坚持决定自我身份的权利(2)

暴动，看到其他人对犹太人的种种歧视言辞与吐口水的举动，从此，他保留了对于犹太民族命运根深蒂固的关切

抱持着和其他犹太人之间强烈的团结意识。

依照这样的史观，门德尔松不必也不需要被拿去跟其他德国作曲家排排坐，因为他的音乐内在含藏着犹太文化、犹太性与犹太意识，在这点上，他本来就跟同时代或更后来的德国作曲

家不一样。别人都在追求表达浪漫热情的音乐语汇时，门德尔松却专心研习贝多芬后期弦乐四重奏，他要窥破其内在神灵性的根源。别人都陷入一种革命的“当代性”狂热中时，门德尔松却慧眼独具，将巴赫伟大的宗教剧《马太受难曲》从遗忘中予以复活，而且自己还写出了媲美巴洛克时代的大型宗教作品，这些成就都跟他的犹太背景，强烈的犹太宗教性，脱不开关系的！

一个明确改宗的音乐家，敌对立场的评论者却都不理会他改宗的事实，他和基督教及德国文化间的关系。一边主张他是个犹太人，所以他的音乐作品无足观矣；另一边则主张因为他是个犹太人，所以他的音乐作品格外伟大、格外重要。

这是门德尔松的悲剧。他没办法决定自己的身

份，或说，他自己决定的身份没受到应有的尊重。攻击他的和推崇他的，都用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身份作为出发点。

这是身份的吊诡。我是谁、我是什么人，这看似最根本、最简单的问题，在人类经验里一点都不简单。往往一个人没办法决定自己的身份，更常见的是，很多人想尽办法地要取得决定别人身份的权力。是的，决定别人身份，强制定义别人的身份，是很大的权力，也是近代社会招惹最多纷争与冲突的关键权力。 [仇恨]

不能对仇恨掉以轻心(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20世纪历史中的这桩重大事件，我们通常都用同样的语言来说明、来形容。如此说明与形容，当然不能说不，但其中藏了一个要紧的盲

点。

我们会先入为主地认定：屠杀六百万犹太人是战争中的行为，是战争残暴行为中的一部分。

六百万犹太人，理应被算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巨大破坏中的一个重大项目。

这样的看法，往往让人忘了退一步问：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真是战争中的行为吗？抑或是和战争同时发生、同时进行的另一桩事情？

我的意思是：杀不杀犹太人，跟德国对外的战争，有直接关系吗？杀或不杀犹太人，会影响德国战争中的胜负吗？

从能够掌握的史料看，我们会得到令人更加不安的答案。若是着眼于战争胜利，德国人其实没什么理由花那么大力气杀那么多犹太人。这些犹太人都不是死在战场上，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以任何形式拿起武器来对抗德国人。这些

犹太人没有国家、不属于任何国家，所以也不存在与德国有国与国间冲突的问题。事实上，那么短的时间内，在非战斗的情况下，竟然死了这么多犹太人，正说明了那个时候欧洲犹太人多么温驯，对德国多么无害。

如果不发动种族大屠杀，战争中的德国不会增添任何危险。相反地，为了屠杀犹太人，德国人必须挪用许多本来可以部署去应付战争的人力物力，设集中营，动用大量交通工具，还要有庞大官僚体系来管理这一套“屠杀系统”。

纯粹从战争角度，德国人没有必要屠杀犹太人。换个角度说，德国人并不是出于战争考虑而发动屠杀犹太人的，更进一步看，巨大的问题浮现上来：那为什么？为什么是德国人犯下恐怖的屠杀罪行？为什么屠杀的对象是犹太人？

历史上的反犹主义

暂时撇开战争，我们必须、只能往更早的历史里寻找答案。历史上，欧洲长期存在着普遍的“反犹太主义”（或称“反闪主义”〔Anti-Semitism〕）的现象。犹太人手上沾染耶稣基督的血，这是犹太人的“原罪”。犹太人保有自己的明确且深厚的宗教传统，不受周遭通行的基督教影响，是犹太人让其他人看来碍眼的理由。更何况犹太人还从事教会禁止基督教徒去做的行业

放高利贷，因而赚了很多钱，当然更加引人嫉妒、怨恨与鄙视。几个世纪来，各地常有零星迫害、杀害犹太人的事件发生。

不过欧洲对犹太人的传统敌意，从来不曾恶化到要将他们赶尽杀绝，要动用国家力量给予“终极解决”的地步。显然解释德国人行为，必须在传统问题上，加上现代考虑。

现代考虑之一，是启蒙主义对欧洲进行的转化，启蒙主义将本来宗教改革对教会的厌恶，扩大成为对宗教的全面不信任。宗教改革带来基督教的严重分裂，接着分裂的教会挟带世俗皇族的力量，引爆了仿佛永远也打不完的宗教战争。连年战争终于迫使欧洲出现了新态度：宗教是祸根，人要和平相处，唯有方法是弃绝宗教、诉诸理性。

19世纪欧洲，哲学取代了宗教、理性思辨取代仪式信仰。理性对宗教的敌意愈来愈深，进而就促使了欧洲人普遍对宗教，尤其是高度依赖仪式与信仰的宗教，采取鄙夷的态度。

欧洲变了，犹太人却没有变。相比较下，犹太人的保守信仰姿态，对欧洲人而言更加难以忍受。尤其是在启蒙理性潮流中才形成民族国家的德国，表现得格外强烈。

民族国家的我群认同

民族国家，正是19世纪欧洲另一股沛然不可御的大潮流。

国家早就存在，但民族国家却是19世纪的新鲜事物。民族国家主义认定国家不是临时、方便的政治组合，而是内在拥有一种超越方便的永恒核心。那是同一民族同一文化打造的坚强团结。大家相信“我群”的强烈认同，激发出对国家的高度支持乃至牺牲热情，使得民族国家格外强悍有力，发展得更快。如此一来，当然也就更增添了民族国家的吸引力。

德国是19世纪后半才统一的新兴国家，国家打造 [仇恨] 不能对仇恨掉以轻心(2)

的过程自然就比英、法更加依赖民族主义精神。也因而德国最清楚显现了民族国家严重的后遗症

强烈的排他性。借由选定异类“他群”为对照，最容易激发“我群”团结意识，如果那个“他群”还被理解为敌人，那么“我群”就不只团结，而且还更加上同仇敌忾的热情了。

德国国家构成的过程，对外有法国、对内有犹太人作为典型的“他群”敌人。正因为那是德国赖以统一存在的根本理由，对法国与犹太人的仇恨就格外深刻严重。

虽然在德国统一过程中，很多犹太人也出力贡献；虽然在创建德国文化上，更多犹太人有突出的表现；虽然很多犹太人选择放弃犹太教，反过来认同德国与基督教

这些力量却还是不足以阻挡根深蒂固的仇恨，随着德国历史变化而燃烧燎原。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挫败，让德国急需找到新的团结自信。于是很不幸地，对于犹太人的

旧仇恨，就成了最容易取来使用的工具了。

20世纪最血腥的种族仇恨，其实多半来自想象，而不是来自具体冲突。犹太人没有打过德国，没有侵略过德国，更别说占领德国了。犹太人对德国没有野心，更不曾出现什么具体德国人和犹太人街头巷战或乡间野战的火并。从具体冲突角度上看，德国人与犹太人间的的问题，甚至还没有“文革”当中一所中学两派斗争来得激烈。

仇恨远比我们想象的来得虚无缥缈。正因为不需要具体的根源，仇恨的蔓延与深化，也远比我们想象的来得快、来得严重。这就是为什么在政治上，对于任何可能开启仇恨想象的言词与观念，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随时警惕的根本理由啊！ [风格]找到自己的风格(1)

在一个看似大者恒大的世界里，如果现实上你

就是个“小者”，该怎么办？

我讲的不是国际局势，不是高科技产业，而是美国的职业棒球。

让我们先看看美国职棒“大者恒大”背后的道理：

原理一，美国职棒联盟坚持近乎绝对的自由竞争立场，不对各队设限，没有薪资上限，也没有复杂的选秀次序安排。换句话说，各队爱怎么花钱、花多少钱去找怎样的球员，悉听尊便。

原理二，每支球队都有主场，主场所在城市愈大，潜在的球迷就愈多，不只是球队可以拥有比较多席位、比较豪华的球场，电视台愿意出的转播金也必定水涨船高。换句话说，人口愈多愈富裕的城市，其主场球队会有愈高的收入。

原理三，人都是自私自利，不会嫌钱多的，职业球员当然也不会例外，所以表现愈好的球员，当然会争取愈高的薪资。换句话说，荷包愈深的球队当然愈有条件聚拢一群最好、最能赢球的球员。

原理四，人都是现实的，球迷当然不会例外。愈能赢球的球队愈能吸引球迷支持，不管是买票进场看球，或在家中开电视看转播贡献收视率的动机，都会随球队赢球增加，随球队输球而减少。换句话说，赢球的，愈来愈有钱，愈有钱就能争取到更好的球员，保证赢更多的球赛。

这套道理，一环扣一环，没什么漏洞吧。问题在，如果你的球队，主场就是个小城市，那怎么办？如果你的球队能付得起的薪水，就是只有纽约洋基队的三分之一，那怎么办？就只能

认命收一些次级球员，在联盟后段班载浮载沉，等待“输球 观众减少 收入减少

好球员被挖角

输更多场球赛”的恶性循环，终于把你逐出市场吗？

道理看起来似乎只能如此，不是吗？然而现实上却不见得是这样。奥克兰运动家队，每年能付的薪水真的只有洋基队的三分之一。然而最近几年，他们年年都在强队前段班之列，甚至还一度缔造过连胜二十场的队史纪录。

奥克兰运动家队的秘诀

运动家队的经营者，不怕人家知道他们逆势崛起的秘诀。这秘诀说穿了，简单到让人难以相信，他们缩小目标，在选择球员时，不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神奇美技，不看他们曾经几回在关键时刻扮演球队救世主，甚至不看他们生涯纪

录上什么最辉煌、最特殊的项目，只看打击者的上垒率，尤其是获得四坏球保送的次数；以及投手不让人家打出全垒打的本事。

真的就这么简单。要当运动家队的球员，在打击上，你至少每十个打席要有一次保送，达不到这种比率，你就算有再亮眼的其他成就，也不可能受到教练青睐，送上大联盟去。要当运动家队的球员，要当投手的，平均每场比赛不能送出超过半支全垒打，要不然管你球速再快、变化球再精准，嘿嘿，人家不要你就是不要你。

运动家队的逻辑思考，几句话就可以说明清楚。棒球比赛里，防守上最大的伤害，就是被对手打出全垒打。全垒打不只是一口气灌进四个垒打，而且打者带垒上跑者全数化为比分，更麻烦的是，全垒打让防守者毫无用武之地。所

以守住全垒打，不让全垒打出现，就大大降低了输球的可能。

同样道理，进攻上最便宜、最有把握的武器，莫过于对方奉送的四坏球了。选球精准、耐心十足的打击者，从投手手上讨到四坏球，一样让对方防守者全无施展机会，只能眼睁睁地断送一个垒，而且还能在心理上扰乱投手，甚至制造投手及其他野手间的内讧心结。赚到保送，绝对有效提高赢球机会。

只看上垒率和全垒打失分率，这样的球员不难找，而且这样的球员别的球队不见得识货，也就能用相对低廉的薪水争取到。一旦整个球队都由这种特色的球员组成时，又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球队文化

那就是耐心、谨慎、不冒进、不贪功。

运动家队磨功一流，打击者不随便出棒，投手

也不随便逞强跟强打者对决。一定是仔细处理每个球，将失投减到最少的投手，才能不被打出全垒打；也一定是眼光利，每一球都跟球、黏球的打者，才能常常赚到 [风格]

找到自己的风格(2) 四坏球保送。

这些球员散落到别的球队，或许发挥不了什么作用。队友、教练可能嫌他们龟毛，球迷嫌他们拖慢球赛节奏，会有各种力量逼着投手激发英雄气概投快速球跟打者对决，逼着打者改挥大棒寻求长打。可是在运动家队，他们的龟毛个性得到肯定，甚至得到奖励，一支个性整齐的龟毛球队，化成巨大的战力，拖垮、打败了许多阵中充满英雄、明星的球队。

这些球员帮运动家队打出了好成绩，可是他们不太可能倨傲，用跳槽来争取加薪。因为赢球的关键是整支球队的风格、个性，不是单一球

员。阵中球员如果单飞去了别的没有耐心、不是龟毛文化的球队里，他们也无从发挥起。

风格对团队的贡献

就这样，奥克兰运动家队在看似被“大者恒大”铁律笼罩的职棒市场上，创造了奇迹。奇迹不是真正的奇迹，而是运动家队总经理比利·比恩（Billy

Beane）独具慧眼，看出了风格、个性，对一个团队可以有多大的贡献。在别人都是各自为政、英雄主义的职棒世界里，耐心、龟毛的统一风格，就能打出一条成功大道来。

这是真正的创意，管理上的创意。而美国职棒场上验证过的创意，何尝不能适用于高科技产业，或国际局势上呢？

高科技产业上的决战点，不见得一定在谁网罗了最多与最优秀的研究、营销人才。许多公司

的崛起，靠的是明白单纯的风格、个性，企业环绕着一种风格，建构其管理锁链、孕育其组织节奏，这种公司显然比较容易找到市场上的利基，集中焦点把事情做好，也相对比较禁得起景气的波动变化。

作为一个注定的“小者”，台湾是不是也该思考，我们要在“大者恒大”的国际舞台上如何自保、如何发展？找到自己的风格、个性，经济贸易上的风格、社会文化上的个性，很可能才是让我们不至于懵懵懂懂终遭大国权力利益吞噬的重要法门吧！

第三辑 走出大词的泥沼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站在人道立场，明确反对美国对古巴的禁运抵制作法。他又基于宗教信念，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面貌，多所批判。

卡斯特罗看中约翰?保罗二世这两项特质，他相信：拉拢教宗可以争取到全世界对古巴的同情

、支持，更可以对邻近的大患

美国，产生一定程度的伤害。

相对于美国，教廷教宗当然是次要敌人。联合次要敌人对付主要敌人，是辩证斗争法里所允许，甚至肯定鼓励的。 [开放]

开放带来的效果(1)

前任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外表看起来如此庄严，其实内在是个富幽默感的人。主持户外大型弥撒时，群众热烈鼓掌叫好，打断了他的话，等闹声终于歇止，教宗说：“我还蛮喜欢你们的掌声，让我可以休息喘口气。”要离开现场时，天空下起雨来，教宗说：“我几乎忍不住要说，这真是个好地方，看到教宗要走了，天空都会流泪难过。但，不对，这种解释是烂神学。好的神学解释应该是，雨是上帝仁慈与关切的象征。”

这两项幽默言语，都是保罗二世访问古巴时说的。说这两句幽默言词时，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都在教宗身边。

那是1998年1月的事。经过长久努力，卡斯特罗终于邀到教宗访问古巴。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后，古巴是极少数极少数仍然坚持共产党革命专政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还因为这样，遭到美国长期禁运经济抵制。

共产主义国家，依循马克思的教条，必然视宗教，尤其是天主教，为“人民的鸦片”；所有的共产国家必定扫除境内天主教会梵蒂冈的臣属效忠，努力隔绝教廷对自己国家人民的渗透影响，那为什么约翰·保罗二世会出访古巴，而且竟然还是卡斯特罗力邀促成的？

关键的原因就在美国禁运抵制。苏联垮台后，原本依赖苏联资助的古巴，陷入了经济上极度

困难的状况。90年代初期，古巴人民真的是勒紧裤带忍受空前的物资贫乏，差一点就撑不下去了。 联合教廷对抗美国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站在人道立场，明确反对美国对古巴的禁运抵制作法。他又基于宗教信念，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面貌，多所批判。

卡斯特罗看中约翰·保罗二世这两项特质，他相信：拉拢教宗可以争取到全世界对古巴的同情、支持，更可以对邻近的大患美国，产生一定程度的伤害。

相对于美国，教廷教宗当然是次要敌人。联合次要敌人对付主要敌人，是辩证斗争法里所允许，甚至肯定鼓励的。

卡斯特罗做了很多调整，例如放松原本古巴境内对天主教徒的歧视、管制，让他们拥有一定限度的信仰自由。1998年教宗到访时，天主教

徒已经可以在古巴参加公开礼拜，除了还是不能担任中小学教师之外，原则上没有其他职业上的限制。

卡斯特罗还找了一位拉丁美洲的主教，进行深度对谈，将对谈内容编辑出版，在书中卡斯特罗将教宗刻画成一个来自波兰、深知底层人民疾苦的自由斗士，一直不断致力于协助大众解脱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的欺骗、压榨，让教宗的一生职志与成就，看起来跟他自己不只有相通之处，甚至如此相近。

从开始邀请教宗，到教宗真正点头答应、出发成行，这一段过程中，卡斯特罗统治的古巴还进行了另一项巨大的改变。古巴的经济重心，从甘蔗等经济作物加上苏联援助，转型成吸引美国以外地区的世界游客。

不论多么痛恨美国，90年代后期古巴的几个大

都市，开始自由收受美金，因为美金是全世界旅游者的通用货币。首都哈瓦那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建，保留了众多的绿树与穿杂其间的小广场，保留了殖民风的街道与房舍，加上古巴人民干净、秩序的生活习惯，吸引了愈来愈多的旅游者，借由他们的旅游消费，挽救了原本摇摇欲坠的古巴经济。

于是卡斯特罗更有待于教宗访问了，教宗访问必然带来大量报道，对古巴的普遍兴趣会被激发，也就有机会吸引更多旅游者，创造更大的美元经济。

约翰·保罗二世风尘仆仆、拖着病躯到了古巴，而且不顾虚弱的身体状况，每天一早就出发到一个城市进行一场大型弥撒，黄昏才回到哈瓦那，最后一天，教宗在哈瓦那最具象征意义的“革命广场”为教徒祈祷，卡斯特罗亲自出席

典礼，古巴官方媒体还帮忙号召群众前往参与， “表达对教宗的敬意”。

教宗在古巴多次明白表达反对美国禁运，多次批判泛滥的资本主义及其庸俗贪婪，这一场教廷与共产主义结合的奇异之旅，也的确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大幅报道，刺激了各地人士到古巴旅 [开放] 开放带来的效果(2)

游的意愿，除此之外，教宗还奉送了巧妙的幽默感。

卡斯特罗得到了他所设计、所想要的，因此他应该是这整件事的赢家了？

教宗访问古巴的影响

不见得。不管卡斯特罗是否预见，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古巴，在古巴产生两项无法磨灭的长久影响。一项是松动了古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强度，能够和天主教共存的共产主义，就

已经不是原来建立革命政权的那个共产主义了

。

第二项影响是使得古巴经济更加依赖旅游。而
要持续吸引旅游者，要振兴旅游业，古巴不可能再关着门不理睬国际观感。古巴不能有政治动荡、不能有仇外作为，甚至不能让国际上觉得那是一个封闭可怕的社会。

美国对古巴进行禁运，是希望借经济压力逼迫卡斯特罗进行改革，让渡出自由与民主的空间，并且降低对美国的敌意。卡斯特罗无论如何不肯对美国低头，所以找了旅游收入来对抗美国的压力，然而绕了一大圈，旅游、开放，毕竟还是使得古巴不可能维持原本的样貌，不得不给予其社会愈来愈大的自由空间。

这几十年逐渐组构而成的全球旅游网络，具有远超过一般想象的影响力。旅游业一方面使得

许多地方快速丧失地理与文化上的特色，令人遗憾；然而换另一个角度看，旅游网络的同质化作用，却也发生在政治体制与运作层面上。

自由、稳定、安全、开放，成了国际旅游的基本条件，于是任何想要加入这套网络得到经济利益的国家，就不得不自我转化提供这样的条件了。 [怀疑] 保持怀疑、思考的态度(1)

以色列作家奥兹（Amos Oz）小时候曾经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他的家从东欧搬到巴勒斯坦，在那里亲历了以色列建国的过程。

英国对于中东地区的控制，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就已大幅削弱。奥兹和当时其他以色列少年一样，疯狂崇拜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他们诉诸暗杀行为来传递最强烈的讯息。

在1944年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由后来当过以

色列总理的贝京（Menahem Begin）领导的组织，一口气炸死了超过八十个人，其中有他们痛恨的美国人，此外却也有无辜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另外在开罗，英国战争部部长被暗杀身亡。英国判以色列复国运动的恐怖分子绞刑，贝京他们就抓了英国军官把他们吊死，以为报复。

奥兹说，那个时候他跟其他男孩一样，最喜欢的玩具是模型小士兵跟各种小武器，每天趴在地板上摆弄自己的“私人军队”，指挥他们攻打白金汉宫。他们相信：唯有让自己变成狮子，证明自己是头狮子，犹太人才有办法在沙漠中各种凶猛动物之间活下去。

1946年以色列建国了，有一个特别的场合，奥兹跟家里的大人一起去耶路撒冷最庞大的会堂，参加群众运动。其中要上台对群众演讲的，

就包括了建国后从地下组织翻身成为台面上政治人物的比金。

比金及其他政治领袖精英，讲的是古典的希伯来语。这是一种从书本、尤其是犹太圣经里复原的古老语言，靠现代犹太人的惊人意志力，让本来已经死掉消失了的语言，重新在日常生活里运用。

可是奥兹他们家，以及会场上坐在后面的绝大部分听众，使用的却是一种俚俗方言的希伯来语。这是他们在东欧犹太区里流传使用的语言。他们大致可以听得懂古典希伯来语，不过有些关键词，很容易产生误会。

例如古典希伯来语的“武器”，发音和希伯来俗语的“阳具”完全一样。“武器”的动词形式，在希伯来俗语里听来，就变成了不堪的“干”了。

虚幻的国家主义

贝京那天演讲的主题，是以色列的困难处境，号召以色列同胞认清危险局势，团结一致，保卫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祖国。贝京的演讲深具煽动性，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可以有效地控制全场群众的情绪，唯一的问题是：他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艾登夜以继日不停供应武器给埃及总统纳赛尔，却没有人、完全没有人供应武器给以色列，慷慨激昂讲的这段话，听在那些群众耳朵里，就变成了：

“艾森豪威尔和艾登夜以继日一直干纳赛尔，可是有谁干我们？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人干我们！”

全场一片死寂。听到这些奇怪的话的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比金却没有注意到，他继续发挥：如果大家选他当总理，他保证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会乐意来干以色列，以色列再也不

必担心没人干了。

前排坐的年长知识分子们，响起了零零落落的掌声，其他人则依然保持困惑的沉默，唯独有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原本是贝京的超级崇拜者，再也沒辦法节制自己，开始冒出大笑来。

全场恐慌的眼光都投注到小男孩身上。那个小男孩就是奥兹。旁边他的祖父又羞又怒，立刻扯住他的耳朵，将他拉离开座位。即使如此，小男孩还是停不住大笑，被拉到会场外，祖父狠狠地赏了他好几个耳光，十二岁的奥兹才终于止住了笑声。同时也止住了他对国家主义的热情。奥兹说：“从那一刻起，我开始逃离国家主义所承诺的复活与救赎

直到今天都还在逃。”

这段故事写在奥兹2004年出版的回忆录里。长大之后，奥兹果真离开了深信以色列国家主义

的家庭，远离祖父、父亲，住到集体农场里去，在那里开始写作，因为出版的小说获得好评，得到集体农场特许，可以有不下田专心写作的一点时间，他一本一本写出深刻剖析以色列社会与犹太人情结的小说，曾经多次被提名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他宁可要真实具体的农场同志情谊，再也不要高蹈却空洞的国家主义。

让他从国家主义幻梦中醒来的 [怀疑]

保持怀疑、思考的态度(2)

契机，是比金一场煽动性的演讲，尤其是在演讲中意外造成的误会。“供应武器”变成“干”，这看来无关紧要，只具有闹剧效果的差错，却直接地帮奥兹揭露了耸动性言词的本质。

空洞的煽动性语言

耸动性的言词，基本上是没有内容的，愈是带煽动力的，能够同时煽动愈多人的，往往愈没

有内容，人有千千万万种，千千万万种个性、千千万万种思想、千千万万种感受，要怎么样让他们同时一起相信同一件事呢？

唯一的方法，那一件事其实没有任何让他们具体去思考、去感受的内容，没有让他们自主地决定要不要同意的内容。煽动的演讲根本就不是为了要讲什么，只是为了要制造怎样的气氛，是挑动起来的气氛，而不是演讲里讲了什么，构成了真正耸动的元素。

换句话说，煽动演讲没有要让人用大脑，煽动演讲不能让人感到一丝一毫的怀疑，一旦怀疑，我们就开始思考。煽动演讲说的，是群众再熟悉不过的话语，用变化控制的音调不断反复、不断反复，直到所有人进入那种情境与气氛中。

奥兹的启蒙，就来自于那偶然的谐音。谐音错

误使得煽动家唱做俱佳的表演破功了。那个错误在听者心中种下了不解与怀疑，他们开始想：为什么会讲这个？他真的要讲这个吗？他到底要讲什么？

一怀疑、一思考，人就进入不了那被煽动渲染起来的气氛里了。作为一个小男孩，奥兹的怀疑用更戏剧性的形式表达出来：他大笑，而且大笑不止。

大笑的当下，付出了挨耳光的代价，然而真正换来的，是从煽动中彻底抽身的宝贵经验。这样看来，那几记耳光，终究还是挺划算的。

[名嘴] 别太相信名嘴(1)

两年前，我带着女儿去参加一项钢琴比赛，比赛完了在等成绩公布时，突然有一个参赛者的家长，冲着我说：“啊，你是那个名嘴对不对？名嘴你好！”

我不自觉地低沉了脸，很不高兴地摇头回应：

“我不是，我不是什么名嘴。”

就在那里，就在那一刻，我心里有一个再强烈不过的感觉：无论如何，我绝对不要被人视为、称为“名嘴”。被用“名嘴”称呼，让我极度地不舒服，更重要的是，我看看身边的女儿，她慢慢长大了，等她更懂事，她一定也不会要自己的爸爸是个“名嘴”。

“名嘴”不是个尊称，甚至不是个正式的工作职业。倒不是说别人讲起“名嘴”往往语带嘲讽意味，也不是一些会被叫成“名嘴”的人有多坏，我真正最在意的是“名嘴”这个称呼的来源，那背后有着彻底违背我的信念的东西。

“名嘴”是个新鲜东西。现在大家讲“名嘴”，指的是在电视上参加政论节目、公开谈论政治议题的人。不过并不是有政论节目就有“名

嘴”。政论节目有各式各样来宾，来宾也就有各式各样上节目的身份与理由，这是原本的情况。政论节目会有政治人物，从“部会首长”到“立法委员”到县市长。政论节目也会有跑政治或社会线的记者，提供他们在线跑来的新闻并帮忙铺陈新闻背景。政论节目还会有学者或专栏作家，负责解读新闻并提供了解政治的观念。

这样的政论节目里，每个人都有他的身份，也就都有随职业身份而来的功能，彼此对话、乃至彼此辩论，让看节目的观众因而得到了对政治多角度的理解。这样的政论节目里，没有“名嘴”，也不需要“名嘴”。所以那时候，没有任何人走在街上会被叫“名嘴”。

敢讲的人能上节目

曾几何时，电视政论节目产生了奇怪的变化。

先是出现了一种人，他们上节目讲的话，跟他们的专业身份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不是政治人物，不是记者，也不是学者，他们或许没有掌握什么比一般观众更广泛或更深入的政治讯息，但他们很会说、很能说，就是靠着“说政治”，让他们在节目里占了一席之地。

再来与此相关，但方向相反的，有了另一项发展：很多有专业本职的人，慢慢不能或不愿上节目了，于是留下来继续上节目的，往往都是“前××”。“前立委”、前县长、前部长、前记者、前教授，他们比现任职业的人少了许多拘束、多了许多自由，也就比现任者更敢讲、更能讲。敢讲能讲就换来收视率，就换来制作人的青睐，这些人在节目上出现的几率自然就愈来愈高。他们不方便再挂以前的工作身份与头衔，就笼统地成了“资深媒体人”，“资

深媒体人”很长、很不口语，于是一转就转成了更容易称呼的“名嘴”了。

“名嘴”取代、凌驾了原来的工作头衔，变成在政论节目讲话的人最突出的共同身份。现任“立委”很多，但只有少数几个具备“名嘴”资格的，才会常常受邀上节目。选择的标准，当然不是谁问政比较认真，也不是谁比较有想法，而是谁比较敢讲、比较会讲。甚至就连“立法院”里某个新闻的当事人，都不见得一定受邀上节目，制作人往往宁可邀不在场但立场更明确、口才更刺激的其他“立委”上节目。更特别的是新闻专业人士的变化。很多人本来是记者，一边跑新闻一边上节目，但是随着节目竞争，记者里同样出现了“名嘴化”现象。变成“名嘴”的记者，通常就离开了记者工作，专心当“名嘴”，可是他们本来之所以能上

电视侃侃而谈，不就靠在线跑新闻累积的经验和得到的讯息吗？离开新闻工作、不再跑新闻，他们不可能再讲那些记者专业的内容，只有转型靠二手传播的内容来做文章。人离新闻现场愈来愈远，可是在节目的收视率需求下，对于新闻、尤其是新闻内幕的说法，却要愈来愈耸动、愈来愈激动。这里面藏着最大、最严重的问题。 恶毒刻薄的说话风格

“名嘴化”的政论节目里，原先的多角分工架构消失了。不再是某些政治 [名嘴]

别太相信名嘴(2)

人物表达立场、某些新闻记者补充讯息与内幕、某些学者提供分析角度观点，现在变成只有一种单一角色

“名嘴”，清一色“名嘴”对“名嘴”讲话。没有人要“名嘴”中立客观，没有人要听“名

嘴”理性分析，也没有人要听“名嘴”来解释政治政策立场，“名嘴”的角色、功用愈来愈清楚

用激动、夸张的口气，讲述大量别人不知道的内幕，并义正词严地谴责被拿来当作讨论焦点的人与事，想出最刻薄恶毒的方法把人与事说得愈不堪愈好。

激动夸张、恶毒刻薄成了“名嘴”这一行的基本条件，不管是蓝是绿，甚至不管是资本主义或劳工立场的信徒，都得先具备了这样的说话风格，才会“升级”成为“名嘴”，才会变成电视上的常客。

同样地，不管什么立场什么主张，要做“名嘴”就得显示出对于自己知道的事再确定不过的态度，即使讲的是人家闺中最深的隐私、最黑暗不可告人的阴谋或最关键的企业机密，“名

嘴”讲来都斩钉截铁，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一点保留：“就是这样！”若是稍露怀疑，对自己说的内幕没那么强烈的信心，很快就会被从“名嘴”行列里除名了。

并不是说“名嘴”个人有多坏有多恶劣，而是“名嘴”这个身份产生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就必然形塑出这样的身份特色与个性来。“名嘴”整体身份，有太多的愤怒激动、太多的自以为是，太少的自我怀疑、太少的冷静分析、太少的耐心说理。他们“太多”的，刚好是我反复自我警惕的；他们“太少”的，刚好是我长期自我期许追求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不能不让自己明确地和“名嘴”、“名嘴身份”及“名嘴性格”划清界线，保持距离。

[法的精神] 比法条更重要的事(1)

“我首先研究人：我相信，在无限参差驳杂的

法律和风俗中，人不是单纯地跟着幻想走的。

”

“我建立了一些原则。我看见了：个别的情况是服从这些原则的，仿佛是由原则引申而出的，所有各国历史都不过是由这些原则而来的结果；每一个个别的法律都和另一个法律联系着，或是依赖于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

有许多真理是只有在看到它们和其他真理之间的联系才能被觉察出来的。我们愈思考到细节，便会愈感觉到这些原则的确实性。”

这是孟德斯鸠名著《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严复译为《法意》）序言中一段关于著作旨意的陈述。

孟德斯鸠这本书，在人类历史上名声可大了。

这本书中将政体分成三种：共和、君主以及专

制，并对三种政体作了缜密的评估，得出结论：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哪一种政体最好？当然是共和；哪一种最差？当然是专制。而他描述的“专制”，正是当时欧洲的政治现实，难怪这本书流行起来，成了共和革命者的圣经。

孟德斯鸠的洞见

《论法的精神》中，还以英国君主立宪为例，讨论了行政、立法与司法的彼此监督制衡，认为这是公民自由保障的关键。“三权分立”与其说是英国人的智慧，毋宁比较接近是孟德斯鸠刻意美化英国状况，提出的人类政治伟大理想。

因为这样的巨大贡献，使得《论法的精神》成了政治学、政治理论上的重要经典，然而吊诡的是，孟德斯鸠本意上希望让此书对于法律能

产生的作用，反而长年被忽略了。

考考台湾政治系毕业的学生，谁不知道孟德斯鸠，谁没有在政治学课堂上听过背过孟德斯鸠的学说？然而换去考考法律系的学生呢，有几个能够正确说清楚孟德斯鸠及其法学上的主张与贡献？

孟德斯鸠讲得很清楚：会写这本书，是因为看到世界各国的法律，表面上看起来天差地别，

“无限参差驳杂”，如果这些那么不同的规范，统统都可以算做法律的话，那么法律就带了高度、甚至无限的任意性了。我们根本无从去掌握法律的“本质”，无从研究法律是什么了。法律什么都可以是，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孟德斯鸠的巨大突破，是不依赖一个先验的答案，假设有神或上帝或什么超越的意志管辖着全天下的法律，给予所有法律一种核心“精神

”。相反，他从比较各种实际存在，五花八门“无限参差驳杂”的法律入手，做比对归纳，去觉察“真理和其他的真理之间的联系”，最后找寻出“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也就是藏在各种不同社会不同法律系统不同法律条文背后，普遍的精神。

虽然孟德斯鸠在序言中特别说他书里“并没有完全叙述细节”，不过被收进书中的细节讨论，已经惊人地丰富了，这些材料很可以让今天学法律的人，了解一下到底法律是怎么来的，牵涉法律的“人间条件”有多么复杂。

不过最要紧的，毕竟还是孟德斯鸠的主旨法律纷乱现象中，应该有其更高的精神与原则，我们不应该迷失在纷乱驳杂的法条中，而遗

忘了、忽略了精神与原则。

用精神、原则来掌握法律、法学，在孟德斯鸠的那个年代，有其特殊历史意义。孟德斯鸠活跃的18世纪欧洲，一方面神权与教会地位不断下降，光靠《圣经》和教宗敕令要规范人的行为，愈来愈难。另一方面，海洋冒险开拓累积的成果，使得欧洲人眼界变宽了，他们看到许多非基督教文明的社会实况，意识到了人的多样性。对于伊斯兰教、中国文明、印加文明、乃至“野蛮人”的认识，又刺激他们回头看见了自己欧洲本身的内部歧异。就连欧洲，也不是像教会主张的那样，就是单纯一致的啊！

如果不追究“法的精神”，那么在多样、歧异的世界中，人的行为就无法规范、更无法预期了，一个法兰西人和一个日耳曼人遇上了，应该遵守谁的法律呢？“法的精神”还有另外一

层更深沉的意义，脱离了孟 [法的精神]

比法条更重要的事(2)

德斯鸠所处的18世纪欧洲环境，仍然持续有效，那就是：世界快速变动，新奇新鲜事物不断诞生，法律无法事先预见未来，订定好完美的法条，法律只能在既有已有的现象后面，苦苦追赶，细心收拾。那么，新鲜新奇事物就不受法律管辖了吗？还有，时代变动了以后，旧法律要如何退场，才能不成为新社会的拖油瓶、绊脚石？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出高于固定法条之上，管辖法条的“法的精神”。法条虽然是固定的、死的，当环境变动时，我们可以用新的变化现象，与普遍的“法的精神”互相参证，来决定新的行为道理，来修改法条的意义。

比法条更重要的精神与原则

如果我们善用孟德斯鸠的智慧洞见，很容易可以得到两项提醒。提醒一，当牵涉到异文化跨国界的行为时，“法的精神”比法条重要，应该要回溯“法的精神”才能订定出规范来。提醒二，如果有些法律条文是很久以前订定的，又没有经常使用，那么这种法条不能随便照字面意思动用，应该回溯比对其背后“法的精神”普遍原则，然后再思考变动过后的新情况，提出法律的新主张新见解。

任何要将法条不经重新诠释，就要运用于管辖乃至威吓不同社会的人或不同时代的人的行为，都是一种“法律暴力”、“法律霸权”。

台湾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有头有脸有影响力的“法律人”。然而这些有头有脸有影响力的“法律人”，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乏对孟德斯鸠的认识、理解，以及对“法的精神”的尊重。

台湾台面上这些“法律人”，受的几乎都是法律的“技术训练”，他们把法条抬得很高，以为法条就是法律的全部，却不知道“法的精神”高于法条，“法的精神”更应该被理解、被讨论。

“法律人”总是习惯想用法律来处理政治问题，这种习惯不只破坏了政治该有的沟通协商空间，而且还暴露了这些“法律人”对法律的轻薄与肤浅啊！ [公共议题]

以公共态度讨论公共议题(1)

当我分析、批评在台湾的都市环境中，因为摩托车太多、太方便，以致捷运系统的利用率偏低时，有人就理所当然反应：“杨照一定是开车的，所以就打压摩托车族。”当我反对以民意来决定要不要废除死刑时，也就会有人到我的部落格留言说：“哪一天当你是受害人时，

看你会怎样说？”

唉，台湾这个社会一个根本的“理盲”，就反映在这样的意见里。他们不相信、不接受有而且应该有不受个人自我利益影响的公共意见，坚持假设：一个人的主张，一定是对应于自我利益的。思考、讨论公共议题时，如果只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反对所有会伤害自我利益的意见，而且把别人的意见都看做是自私自利的反映，老实说，公共议题就失去了公共性，理性讨论、厘清是非的公共领域也就消失了。

今天即使我骑摩托车，我还是会主张摩托车太多了，应该让摩托车不要那么方便，摩托车享有的许多方便（例如到处可以停车）是建立在社会外部成本上的；我还是会主张应该要让摩托车的方便程度低于大众公共运输系统才是合理的。事实上，正因为如此主张、如此相信

，所以我不骑摩托车，我会去搭公交车、搭捷运。

如果我是个犯罪的受害者，我还是一样主张不能由受害者的感受来决定犯罪者应该得到的惩罚。人类文明的发展会逐步将惩罚的权利

先是执行惩罚的权利，接着是决定惩罚的权利一步步从受害者、受害者家属手中取走，是有其基本道理的。因为满足受害者情绪，不只不切实际，而且会产生恐怖的后效。

对纳粹罪行的制裁

德国纳粹屠杀了六百万个犹太人，在这过程中，有许多德国人参与其中，有更多德国人支持赞成，几乎其他所有的德国人都袖手旁观、没有反对，这是个可怕的事实，更是个可怕的罪行。二次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暴露出来，而且还有些幸存的犹太人可以

对罪行历历指证。依照德国罪行之严重，幸而逃过魔掌活命的犹太人，难道会愿意和这样的凶手一起生存在世界上？他们难道不会心存余悸，害怕、相信：只要德国人还在，犹太人就无法好好活着？犹太人之中有些人深信必须血债血偿，不能忍受德国继续存在，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吧？可是从头到尾有权利决定战后处置的各方势力，都没有将“毁灭德国”纳入可能办法中考虑过。被害的犹太人不想要毁灭德国吗？他们没有权利要求毁灭德国吗？然而不管他们怎么想、怎么主张，毁灭德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作法。

更令人遗憾的，国际上找不出一种可以依循的正义原则，来处罚德国，建立国家行为上的罪与罚比例原则。几十年下来，犹太人就一直紧抱着自己是受害者的立场，以受害者的怨恨心

情，一方面对国际提出种种要求，另一方面合理化自己的各种行为。几十年来中东问题的根源，乃至阿拉伯世界被激进的伊斯兰信仰席卷，都跟以色列、犹太人长期的受害者心态脱离不了关系。

受害者觉得自己应该拥有报复的权利，至少应该拥有不再受害的权利，然而在追求自己的安全感时，他们侵犯了别人的领土、破坏了别人的社会，引发出一连串难以收拾的后遗症。无法处理受害者情绪，坐视受害者情绪无限上纲放大，是在犹太问题上，国际上犯的重大错误，至今还在为这个错误付出惨重代价。一个意图发泄的受害人，必定会在发泄过程中制造出其他受害人，最后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身份缠扰混淆，人人都是受害者，都以受害者身份来合理化自己的任何行为，那么脆弱、难得的文明

秩序就岌岌可危了。

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家园被以色列占走了，他们是受害者，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发动恐怖主义行动，那是他们寻求受害补偿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想坐视恐怖主义攻击蔓延，我们就必须设下底线，是就连受害人寻求报复、补偿时都不能也不应逾越的。如果要在恐怖主义行为上划这样一条红线，那么显然对于犹太人、以色列的行为也要有相应的一条红

[公共议题] 以公共态度讨论公共议题(2)

死刑存废不可由受害者决定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我自己是受害者，我却一定坚决反对以受害者的主张来决定罪与罚的根本理由。让受害者得到发泄满足，绝对不会给我们带来安全的社会、安全的环境，相反，过度放大受害者与受害者家属的感受，甚至以各种

方式放大他们的痛苦，来压过法律正义全面、一致性的考虑，只会使得社会进入一种“以暴制暴”的幻想中，结果鼓舞大家合理化暴力的使用，暴力报复成了受害人应得的补偿，暴力就不再是那条绝对禁制的底线。

“不可杀人”有例外，在受害痛苦中的人就可以主张杀人作为报复、作为解脱，有这样的例外，也就会有各种利用这种例外作借口的其他行为。更何况受害者的身份是主观的，一位自认受害的人，在法律之前很可能根本不是无辜的。加害犯罪的事实当然不能交给受害者来决定，在这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都不能光是听从受害者，为什么在决定惩罚方式，尤其是最严重的惩罚，我们却要把那么大的权利让渡给受害者？

要不要废死刑，这是法律专业不可让渡的权利

，尤其绝对不能让渡给受害者、让渡给一般民意。不然我们还要法律专业干什么？不然，我们还能如何信任法律专业能够盱衡各方因素，给我们一个尽量趋近安全、远离暴力威胁的公共、集体环境？这是公共议题，就必须以公共立场、公共态度来讨论啊！ [大片]

比简单更简单的大片逻辑(1)

李安拍过的电影里，有一部到目前仍然拥有特殊的票房纪录。猜猜看，是哪一部？又是什么样的纪录？

不是《卧虎藏龙》，不是《理性与感性》，是《绿巨人浩克》，这部电影上映第二周周末票房比第一周周末惨跌了70%，创下了纪录。

不必也不能因为电影是李安拍的，就不讲清楚这项纪录的意义

意味着电影口碑很糟很糟，刚上映时被强力宣

传打到买票进场的观众，看过之后都大失所望，大家恶评不断，所以下个周末就没什么人再要去买票看的《绿巨人浩克》了。

这纪录还真尴尬。不过让李安可以稍微得到点安慰的是，一般所谓的“票房大片”，首映周末票房到第二个周末，也会平均滑落五成左右，换句话说，《绿巨人浩克》虽然是最糟的，但其实没有糟到那么糟。 跑赢影评

事实上，发行这种“票房大片”的公司，早就习惯、甚至预见了这种差距变化。他们将“大片”的回收成败关键，几乎都赌在首映周末上。这种“大片”首映在全美至少要有两千家影院放映，那两天票房卖下来，正常应该要占那部电影总票房的25%到40%。

他们认为，他们相信，这样才拍得了、才支撑得起制作那动辄上亿美金的“大片”。庞大的

投资使得“大片”经不起评论、口碑的风险，要在评论、口碑还来不及发挥作用前，就先抢下一定的收入。

“大片”的投资保障，就在于等影评、口碑发出“这是烂片”的警告时，已经有很多人在首映第一时间付钱当了冤大头，来不及反悔了。

要造成这种“首映行情”，“大片”也就有了

“大片”特殊的秘诀。第一，“大片”要有“大场面”，场面大不大，不是以演员会不会演戏、演得好不好来判断的，而是依据演员可以吸引的媒体注意力来判定。大场面让电影未拍先轰动，可以不断炒作话题，制造“电影要来了”的先期效果。

能吸引媒体注意力的大明星，片酬一定很贵，片酬愈贵的大明星，连带也就愈有媒体报道的价值。既然花了那么多钱签下“大场面”，当

然也就不能省宣传造势预算，最好是铺天盖地撒广告预算，上映前让可能的观众一个都逃不掉。

除了“大场面”，另外一种预热票房的方法，是选择本来就已经受欢迎的题材来拍，畅销小说是当然选择、畅销漫画会是更好的选择。要不然也可以拍之前畅销大片的续集，反正与其去寻找、去创造观众，不如直接对已有的、明确的消费群体下手。

再来，不只要激发这些群众想去看电影，还要让他们“迫不及待”要去看。如此才能将效果集聚在首映周末，以免夜长梦多，一开始没买票，后来就有了各种考虑不想去买票。从观众属性上去分析：什么样的人最是具备“迫不及待”的个性？啊，小孩！小孩最没有耐心等待，他们想要的恨不得立刻就得到，而且小孩之

间的同侪影响力最强，同侪压力最大，集体行动的动机也最强大，别人都去看过了自己还没看，格外容易觉得落伍丢脸。

吸引小孩看的电影，不能有太复杂的内容，尤其是不能有冷场。炒热银幕场子，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速度竞逐以及爆炸破坏。

相反地，让银幕场子冷掉的，首推对话，尤其是任何一个角色连续讲超过三句话。

“不说话”的大片

接连不断的追逐、爆炸，愈写愈俭省的对白，还能创造出好莱坞大片的另一种优势

海外票房的优势。讲英语的电影卖到不讲英语的国家去，那些地方能欣赏细腻对白的观众必然更少，干吗折磨他们要一直盯着银幕下方的字幕才能享受电影呢？少讲话，话越少观众会越多。

还有，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电影市场像美国好莱坞那么大，也就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电影工业可以跟好莱坞比财大气粗。追逐、翻滚、爆破、灾难，这些银幕上的奇观，全都是钱和技术堆出来的。爱情片别的国家可以拍，亲情片、阴谋片、推理片、社会写实片，别的国家可以拍，只有追逐、翻滚、爆破、灾难不断的电影，谁都拍不赢好莱坞。 十几二十年来，这套大[大片]比简单更简单的大片逻辑(2)

片逻辑发展得愈来愈完整，运作得愈来愈熟练，也就决定了我们在电影院里看得到什么样的电影，又必然看不到什么样的电影了。

没有了真正给成熟观众看的电影。没有了给人强烈感受让人思考的电影。没有了中等规模精致制拍的电影，要么是经费少得可怜，根本照顾不好细节的小众电影，不然就是经费大得吓

人，特效与宣传远比剧本、导演重要的“大片”。

“大片”也就一看就是“大片”的样子，没有什么多样变化的空间。“大场面”的男明星，要么忙着开快车、开更快的飞机，不然是忙着将东西炸掉，再不然就是忙着逃躲避免被炸掉被压死或被淹死。“大场面”的女明星呢？她们做的事和男明星差不多，只是表情更惊恐、穿着与动作更诱人罢了！而不管男明星或女明星，话都很少，阿诺德·施瓦辛格在《终结者》第一集片中从头到尾的台词一共只有十四句，堪称典型中的典型！

大片逻辑，彻底改变了电影工业，改变了我们看到的电影。对一个在大片逻辑横扫之前，就开始看电影的人，现在的电影，尤其是那些主流“大片”，简直难看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花

那么多钱拍出一幕幕重复的戏，一出出重复的电影，干吗！

不过谁知道呢？或许下一代看电影的人，除了这种“大片”，就再也不能想象有别种电影存在。那么，“大片”改变的，就包括了最基本的美学品味，同时也就改变了人从电影里可以寻求、可以获得的满足范围。由广而狭，一步步限缩狭窄下去。 [独家新闻]

跑出真正的独家新闻(1)

两位《华盛顿邮报》地方版的年轻记者，加上一位神秘的消息来源“深喉咙”，结果掀开了“水门案”，最终逼使那个时代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

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仓皇辞职下台。这是政治史上的关键事件，更是新闻史上的经典。“水门事件”示范了新闻记者作为“无冕之王”

的巨大力量，以及“第四权”可以对其他三权发挥监督作用的极致。还有，示范了新闻记者的勇气、风骨与专业伦理。不只是最后将总统掀下台的结果长期让人津津乐道，在过程中记者的作为与选择，也反复被拿出来讨论。

虽然拥有“深喉咙”这样的超级网民，伍华德（Bob

Woodward）跑新闻可一点都不轻松。“深喉咙”从来不主动提供消息、数据给伍华德。而是当伍华德和他的伙伴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找到了什么线索或取得了什么讯息时，就在家窗口摆放一盆约定好的小盆栽，

“深喉咙”开车路过看到了，会在那天深夜到约定好的停车场和伍华德见面。见面时，伍华德告诉“深喉咙”他手上握有的讯息，“深喉咙”凭借经验及内部数据告诉伍华德，哪些地

方值得进一步探索，哪些数据根本一文不值。

会面完，伍华德继续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挖新闻。

深喉咙的真实身份

可以想见有多少压力堆积到这两位年轻记者的身上。他们原本甚至不是跑国会、跑白宫的政治记者，光是《华盛顿邮报》内部就有多少人眼红，冷眼看他们，更不必说其他媒体也纷纷出动最资深、最强悍、最有人脉的记者来抢线竞争。他们都挺住了。更神奇的是，一直到尼克松下台，甚至一直到尼克松去世，除了他们两人和《华盛顿邮报》总编辑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深喉咙”的真实身份。甚至连《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西泽

琳·葛兰姆都不知道！保护消息来源保护得滴水不漏，一直到几年前，“深喉咙”自己主动曝光，世人才晓得原来他是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

的副局长 难怪他知道那么多事！

“水门案”发生在四十年前，正因为“水门案”的成就、影响如此传奇，这四十年间有多少人想要当“伍华德第二”，希冀能碰到“深喉咙第二”，就连台湾都有一阵子大谈特谈过“深先生”、“深小姐”。不过政治上的发展，尤其是新闻媒体上的发展，显然让“水门案”再现的机会，愈来愈渺茫了。将最高权力者拉下台的“水门案”，不但在当时是空前的，恐怕在未来也会是绝后的。 “想象一下如果深喉咙

存在于今天，那会怎样？有线电视频道上每天都在猜他到底是谁。狗仔队会盯梢伍华德，会有很多篇关于他的报道。还有新闻幕后的故事，揭露新闻记者平常到底怎么和消息来源互动。顺带讨论新闻伦理的问题，对待消息来源的

原则究竟应该怎样。新闻画面上会出现倒数计时钟，计算尼克松大概还有多久会下台，无数网站都在讨论深喉咙的身份，而且对伍华德和伯恩斯坦写的报道进行深入分析，检讨其语言用法。所有这一切，都在稀释独家新闻的浓度，更要命的是，都在模糊独家新闻真正要报道的故事。”

说这段话的，是美国广播网的政治组组长哈尔普林（Mark

Halperin）。他很了解什么是今天的独家新闻，也更明白今天独家新闻碰到的问题。哈尔普林是个“信息狂”，每天夜以继日整理消化美国政治讯息，他负责编写的“每日笔记”，是新闻同业及政治领袖每天必读的材料，追读“每日笔记”，才不至于在政治消息上落伍。可是就连哈尔普林都跑不出独家新闻了，因为今天

的新闻业者失去了“水门案”当年的那种职业原则与职业自尊。

那年头看到伍华德和伯恩斯坦的独家突破，同行们想的是如何加紧努力，抢在他们前面揭破“水门案”内幕，如果无法最早最深入报道这条关键新闻，那就是输了，只能认输。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不会认输，他们有各种招数让自己不输。

一种方式是借谈话节目提供评论，抢夺“话语权 [独家新闻] 跑出真正的独家新闻(2)

”。一种方式是针对别人的消息来源做报道，更狠的、更贱的方式，是干脆拿人家跑出新闻的记者当材料来做文章。如此一来，大家都能在这件事上插一脚，有自己的“角度”切入，切来切去，各种外围相关不相关的故事、说法满天飞，结果让本来的独家新闻也都失去了震

撼力。大家都不输，都有戏唱，都不失面子，都能在“独家”当中插一脚，独家不再是独家，独家新闻也就再也不会强大到震倒一个总统了。新闻界用这种方式稀释新闻、模糊焦点，同时也就提供了政治人物们“翻云覆雨”（spin）的机会。 政治人物的反制招数

相较之下，当年最狡猾最滑头的尼克松，现在看起来天真得可怜，只能坐视“水门案”的火愈烧愈接近自己，干着急却无法可想。今天的政治人物好过多了，大可以配合新闻界的动作稀释，进而逃避被揭露的丑闻。反正没有人愿意投降接受别人的独家，所以A报纸有了不利你的独家，最好的方法就是赶快制造一个耸动的内幕喂给B电视。B电视自然会使尽浑身解数去替你压制A报纸。另外也可以联络相识的“名嘴”，利用评论意见，要么将新闻曲解向对你有

利的方向，要么夸大影射、爆料其他新闻，掩盖对你不利的消息。至不济，政治人物还可以发动反攻，把记者挑出来放到镁光灯下，把他写的文章拿来分析反驳，想办法把敢对你不利的记者弄到又腥又臭。

“水门案”那种独家新闻消失不见了，从表面上看，新闻变得比以前热闹多了，然而热闹中也就少掉了专注焦点，

每件事只能得到一小部分注意，于是每件事也就都不会是可能引起全民公愤，爆发真正改革力量的“大事”了。“大新闻”消失的同时，也就带走这个社会的“大事”。放眼望去到处都只有吵吵闹闹的小事，这样的社会，算是变好还是变糟了呢？ 第四辑 迈向聪明社会

琳·考克斯不是等闲之辈，她真的不是一般人。她十二岁开始专注于海泳。十四岁，她游过南

加州外的加塔利纳海峡，花了十二小时又三十六分。接着，十五岁时，她就挑战长泳者的圣地

英吉利海峡。横渡英吉利海峡，至少要游二十五海里以上，看海潮状况和选择的方向而有不同。和加塔利纳海峡相比，英吉利海峡的海水冷多了。夏天时，英吉利海峡水温维持在摄氏十二度到十五度之间，比加塔利纳海峡低了四五度。然而，第一次参加英吉利海峡横渡大赛，琳·考克斯就以九小时五十七分的成绩，打破历来不管男女选手留下的纪录。那是1972年。1973年，一个成年男泳将，超越考克斯的纪录。不甘心、不服气的考克斯1974年再度参加英吉利海峡大赛，这回她将纪录推进到九小时三十六分。 [冒险] 彻底的、小心的冒险精神(1)

2002年年底，人类“极限纪录”上添加了一笔

美国女泳将琳·考克斯（Lynn Cox）成为第一位“游上南极洲”的人。

全世界绝大部分人，没有去过南极洲。少数有幸到南极洲旅游的旅客或研究者，大概不外经由两种方式

搭乘具有破冰功能的特殊船只，或冒更大的危险搭小飞机降落在克难的机场上。

琳·考克斯和一群旅游客一起搭乘南斯拉夫籍的破冰船，经小猎犬海峡接近南极洲大陆。那是南半球最炎热的季节，融冰后露出南极大陆的边缘。船沿南极大陆航行，越过涅柯港（Neko Harbor）后，考克斯从船舷上步下阶梯，深呼吸一跃入水，花了二十五分钟时间，一共游了一点二二海里，到达南极大陆。

表面上看，这纪录好像不怎么样嘛！前后不到半小时，游的距离算算还不到两千米，琳？

考克斯会游，难道别人不会游？我们每年一度的“万人泳渡日月潭”活动，参加的人不都有差不多的本事吗？

别被这种表面的数字给骗了。真正最重要的数字是

考克斯下水时，海水温度接近零度冰点。而且她游过的海域，还到处有浮冰，小块一点的浮冰，随时可能划破她的皮肤；大块一点的浮冰，随时可能把她撞昏过去；更大的浮冰，随时可能裂解崩落，把她困在冰堆里，再也别想出来。还有，海上吹着风。考克斯正常的泳速大约每小时两节，然而变化无穷的海流随时可能制造出超过两节的逆浪，换句话说，如果情势不对，考克斯怎么努力游都无法前进，甚至会被海流推着离岸愈来愈远。

游泳对人类最大的挑战，不是如何浮在水中，

而是如何保持身体温暖。在低于体温的水中，我们的血液一传送到皮肤表面，就快速降温。这些“冷血”必须在送回心脏循环的过程中加温回升到正常程度，才能维持肢体正常活动能力。为了避免体表的快速失温，身体会自动调节，减少往血管末端输送的血液。然而其附带效应就是肌肉容易缺氧，而且末梢神经细胞进入停滞、萎缩状态。如果体表丧失温度的速度持续高过体内循环增温的能力，那么到一个点上，送回来的血液温度过低，将导致心脏无法正常运作，人就瞬间昏迷，再也醒不过来了。这当然不是开玩笑的事。这也说明了，游上南极大陆，对每只企鹅来说是何等轻松容易的事，但人类，嗯，还真没人敢尝试。

挑战极限的考克斯

琳？考克斯不是等闲之辈，她真的不是一般人。

她十二岁开始专注于海泳。十四岁，她游过南加州外的加塔利纳海峡，花了十二小时又三十六分。接着，十五岁时，她就挑战长泳者的圣地

英吉利海峡。横渡英吉利海峡，至少要游二十五海里以上，看海潮状况和选择的方向而有不同。和加塔利纳海峡相比，英吉利海峡的海水冷多了。夏天时，英吉利海峡水温维持在摄氏十二度到十五度之间，比加塔利纳海峡低了四五度。然而，第一次参加英吉利海峡横渡大赛，琳·考克斯就以九小时五十七分的成绩，打破历来不管男女选手留下的纪录。那是1972年。1973年，一个成年男泳将，超越考克斯的纪录。不甘心、不服气的考克斯1974年再度参加英吉利海峡大赛，这回她将纪录推进到九小时三十六分。

然后她对英吉利海峡没兴趣了。1975年，顶着最高达到九英尺的浪头，花了十二小时，她成为第一个从新西兰北岛游到南岛的女性。1976年，她游渡麦哲伦海峡；1977年，她绕着好望角游了一圈；然后又去波斯湾，从埃及这岸游到以色列那岸，再游到约旦境内的海岸。1987年，她只花了两小时，就游渡白令海峡。那一年她三十岁。

麦哲伦海峡和白令海峡都是水温很低的海域。科学家当然好奇琳·考克斯为什么能够不失温。游渡麦哲伦海峡时，在一般人感受的冰水里游了四小时，她的体温非但没有下降，竟然还从华氏九十七度升到一百零二度。在科学实验中，考克斯和一群人泡在不到摄氏五度的冰水中，只能挥动双臂。结 [冒险]

彻底的、小心的冒险精神(2)

果发现考克斯的体温只在开始时下降了一些，随后恢复而且维持正常，一个半小时内不曾再有什么变化。一起参与实验的人，只有另外一位没有失温，那是一位冰岛的渔夫，那人曾经遭遇海难，全船人员只有他一人幸存。

毫无疑问，琳·考克斯天赋异禀。然而知道自己在海中比别人强得多，考克斯还是继续探索自己的极限。所以才会在超过四十岁后，决定挑战南极洲海域。

琳·考克斯天赋异禀。不过为了短短二十多分钟的泳程，她花了整整两年做训练准备。为了不让头部及胸部太快失温，她强迫自己练习抬头蛙姿势游泳，使头及大半胸部全程露在水面以上。如果用力大动作踢水，那么下半身体表与冷水接触的面积将巨幅增加，于是她还必须尽量少动腿部，几乎全凭手臂划水来前进。

她找了很多专家分头研究帮她的忙。重量训练专家帮她增强肌力，以使她游得更快，制造出更多体内热量。医学专家随时检测评估她的身体状况。她还请教了动物专家，理解企鹅如何保暖以及在水中快速运动的秘诀，为了向企鹅看齐，考克斯刻意留了长发盘在泳帽里，用来存留空气保暖；她还让自己增胖将近十公斤，储备足够的脂肪。

当然，还要有对南极洲环境下过工夫的专家，建议她选择什么地点，在怎样的条件下水游泳。考克斯正式游向南极大陆时，她身边环绕了三艘载满助手的小艇，有的负责帮她计时算距离，有的帮她观察浮冰指引方向，有的预备提供必要医疗支持，还有的为了在她上岸后立刻帮她挡风换衣服，并以体温帮她恢复身体正常状态。 冒险本身就是价值

如此大费周章为了什么？为了证明人类可以做到南极企鹅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得到的事吗？不是，为了满足琳·考克斯的冒险精神。这是最大的目的。美国那个社会，广义来说，现代西方社会随时准备支持协助像

琳·考克斯这种具备冒险精神的人。他们不会轻蔑地问：“游到南极去干吗？”他们只问：“怎样才能突破层层难关，游上南极大陆？”克服困难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这过程本身就是价值，就是意义，也就是目的。

冒险不是暴虎冯河，别人不敢做的事你敢做。

冒险的真义是成功克服别人克服不了的困难。

追求成功，所以也就要仔细设计规划，一点都莽撞不得。别搞错了，真正的冒险家，个性不会冲动到哪里去的。用这种标准看，我们不妨做点思考演练：有冒险精神的社会，跟没有冒

险精神的，会拉出怎样的差异差距？台湾这个社会，有还是没有冒险精神呢？我们需要还是不需要冒险精神呢？ [海洋]

如何拥有海洋文化(1)

1895年4月，史洛坎（Joshua Slocum）驾着他自己建造的船“浪花号”，启程远航。船上只有他一个人，而且除了风帆，“浪花号”没有其他动力。

史洛坎说他要驾着“浪花号”环航世界一周。他的亲人和朋友，既然没办法阻止他，只好祝福他。不过谁都不相信史洛坎真的能航行那么远。尤其是，史洛坎那年不年轻了，已经五十一岁；尤其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单独驾船环航世界过。

经历了三年又两个月，出乎所有人预料，1898年6月27日，史洛坎返航回到了美国罗得岛，完

成了他的壮志，一共航行了四万六千海里，绕行地球一周。

他怎么做到的？大家惊异传闻。只有一个人在三十六英尺长的小船上，当他需要睡觉的时候，谁来帮他掌舵才不会错了方向？遇到风暴大浪时，他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处理风帆，才不至于在大海中倾覆？更重要、更关键的问题：他如何度过漫长的孤独时光！航程中经常有几星期甚至几个月没有靠岸，要怎样才能不被那单调的景色、同样的航程给逼疯呢？

也许就是为了要一并回答所有人的这些疑问吧，史洛坎回到美国的第二年，出版了《环球独航》（Sailing Alone Around the World），告诉我们那三年时光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

书里有些部分，证实了大家的猜测想象。环球

独行的确要经历许多危险，例如从印度洋要进入太平洋时，强烈的风一度将他的船吹回马六甲海峡。短短几百海里的航程，史洛坎顶着风、顺着风、斜对着风，花了好几个星期才走完。那片海域如此凶险、如此恶毒，让史洛坎无论如何不愿钓食鱼类或捕杀鸟类，他感觉到与这些生物有着共同对抗自然风浪、艰苦求生的同志感情。

人类与海洋的黄金年代

史洛坎也证实了，在别人到不了的偏远角落，会遇到奇怪的人与事。就在“浪花号”抵达印度洋上的罗德里盖兹岛前几天，岛上的神父用恐吓的口气预言：因为岛民信教不够虔诚，反基督的恶魔将要降临。所以当岛民看到一艘莫名其来历的船漂摇进港时，简直吓坏了。许多人吓得躲在家里，连续八天不肯出门，甚至不敢打开窗户透透气。

不过《环球独航》书中的其他部分，却提供了非常不同的解答，与大家的想像相去颇远。整本书的调子如此平缓，如此从容不迫，一点都没有创造历史的冒险家那种自大傲慢与焦躁夸张。史洛坎让读者明了，靠自己对海洋的认识，靠自己的双手，打造“浪花号”是最重要的起点。他和“浪花号”几乎结合而为一体，“浪花号”任何细微的变化，他都能立刻直觉、自然地做出反应来。所以他不只能轻松地每天手握着船舵睡觉，边睡边维持方向，他还能预知海洋的动态，让自己远离无法处置的危险状况。让人愈读愈惊讶的另外一点

史洛坎似乎都不寂寞、都不孤单。在我们以为单调无聊的海上，他可以用船帆和风进行无穷对话， he 可以和同样依赖风来远行的大型候鸟并肩齐航，观察、体会它们美妙飞行的秘密。

大海里更有各式各样的生物，上演着永远不重复的光影动静景象。

海上还有其他船只。在海上相遇，几乎毫无例外会有他乡故知的热情。大船邀请小船的人移驾，在甲板上或船舱里喝茶聊天。到了非得各奔前程时，大船还会不吝惜昂贵的火药，热闹地鸣枪相送。

原来海上自有其热闹，海上自有其趣味，只要我们真正懂得如何亲近海洋，活在海洋的包围里。这应该是《环球独航》放送出的最重要讯息吧！

那个时代，史洛坎的时代，是人类与海洋互动的最后一段黄金年代。从15世纪开始，西方文明爆发出冒险精神，强迫原本只懂得在陆地上生活的人，到海上去。经过几百年，付出了无数生命代价，人类才终于累积了足够的知识，

不只在海上存活，而且能够与海洋共存。19世纪，人有了够多和海洋相处的记忆、经验，而萌发了将自己视为海洋生物的新意识。史洛坎显然就是这种新 [海洋] 如何拥有海洋文化(2) 意识下的产物。

他有能力而且有热情，打造自己的船，当他驾着“浪花号”出港时，他的心情截然大异于几百年前的哥伦布或麦哲伦。海洋不再是必须被超越的障碍，也不是必须被征服的挑战，海洋是另外一种存在的可能性，海洋是包容、接纳人类的新环境，只要人类愿意改造自己去适应海洋。 海洋国家在哪里？

可惜的是，那段黄金时代来得迟却去得好快。1909年，六十五岁的史洛坎再度出航，他要前去南美洲，进入亚马逊河去探索。这次他一去就没再回来，彻底失踪了，甚至不知道究竟在哪

里消失的。和史洛坎一起消失的，是那个人类朝海洋动物演化的漫长过程。

风帆消失，蒸汽动力取而代之，切断了人与风的亲密关系。愈来愈大型的船只，装上了各式各样模仿陆地生活的用具，隔绝了人和海浪变化的感官对话。进而各种高效率的拖网到了海上，也就有效地阻止了人对海中生物的认同，人在海上纯粹成了过客、成了掠夺者，海与海中生物，也降至被掠夺的悲惨地位了。

再进一步，航空事业快速发展，从这个大陆到那个大陆，不再需要通过海洋了。在人类生活意识里，海洋最主要的特质消失了，那就是海洋的广大无边，海洋的变化无穷。坐在航空器里飞越海洋，海洋只是一个抽象的距离数字，不再真实。人类只从远远的空中俯瞰海洋，或只在岸边享受海滩阳光，以及极其有限的几十

公尺海洋

没有大浪没有大鱼没有大鸟的安全海域。

我们有机会吃到种类繁多的海鲜，可是我们对这些鱼虾贝类的了解，却如此肤浅。我们有机会从科学家的报告、国家地理杂志的频道上，看到海鲜的种种奇观，然而那些奇观与我们封闭安稳的陆地生活完全无涉，我们“知道”海洋，却无从“感受”海洋。

对于海洋的“无感”，在台湾这个岛上尤其严重。尽管从政治意识形态上鼓吹“海洋国家”，尽管在“行政院”组织法里还要设“海洋委员会”，但是他们的“海洋”，和史洛坎的经历、和他留下的纪录相比，显然只是空洞、抽象、功利的名词罢了。

这些号召“海洋”来塑造自我身份的人，曾经真的对海洋好奇，或至少对人类有过的海洋经

验好奇吗？当一整个社会的人，除了海边戏水、近海远洋捕鱼以外，没有其他海洋经验与海洋视野，我真不知道如何可能硬是去打造一个“海洋国家”来呢？ [现实]

“非现实”的巨大力量(1)

1859年10月16六日，一个下着雨的星期天晚上，十七道黑影逼近位于弗吉尼亚州蓝岭山（Blue Ridge

Mountain）的美国联邦军火库，趁暗发动奇袭，一举抢占了这座军火库。

军火库所在位置，俯望两条大河汇流处，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曾形容那景色是“大自然间最壮丽的面貌”，“值得为看一眼这美景而渡过大西洋”。

不过，带领发动奇袭的约翰·布朗（John Brown）对大自然美景一点兴趣都没有。燃起他

热情的，是一股使命感，他相信上帝要他来到世间，尽一切可能终结人类最大的罪恶美国的奴隶制度。

布朗自己是白人，但却不惜为黑奴的自由对抗自己的政府。他心中的上帝，比政府更重要；他看到的奴隶制度邪恶景况，比谋杀、抢夺更低劣一百倍。

1850年代，美国最敏感的话题，就是南北方在黑奴问题上的巨大歧异。在南北交界，态度不明的堪萨斯州，冲突尤其严重。蓄奴主义者与废奴主义者，都视堪萨斯州为必争之地，绝不可稍让。

1856年，布朗就曾带着他两个成年的儿子，在堪萨斯州绑架了五位蓄奴者，将他们活活打死。他主张对待蓄奴者不能有丝毫仁慈，暴力与恐怖手段，最直接最有效可以达成废奴的目的

。

布朗不只痛恨南方的蓄奴者，他也没有耐心倾听那些北方和平渐进废奴的意见，他认为废奴哪有多难，找到对的方法，而且下定决心去做，一夕之间，人类就能□除巨大的罪，重返上帝的国度。

1859年袭击军火库，就是他认定的“对的手段”。他的逻辑很简单：南方黑奴生活水深火热，天天都恨不得能逃走，所以只要在靠近南方各州的地方，占领一座军火库，让消息传出去，这些黑奴们就会立刻奔走来归，逃到军火库基地来的每个黑奴，都能得到武器，瞬间就聚合成战力强大、沛然不可抵御的反奴大军。有武力在手上，南方奴隶主们只好屈服。

布朗还想得更远。一旦南方黑奴都被解救出来，他们可以到西部寻找一块土地，建立自己的

国家，再跟美利坚合众国结盟为兄弟之邦。这样，不只实践了道德正义，也最符合白人组成的美国之利益。

“一个人加上帝，就能扭转宇宙。”据说这就是布朗的信念。年轻的时候，布朗就将自家位于纽约州北部的农场，建构成为让黑奴偷偷转往加拿大寻求自由生活的中继站。不过年纪愈大，布朗愈是不耐烦帮助一个个黑奴，他想的、他要的，是以自己和上帝的力量，一举彻底摧毁南方奴隶制度，“扭转宇宙”。

那个下雨的星期天，布朗觉得自己站在宇宙扭转的起点上，只可惜，事件没依他想的那样简单、直接地开展。

攻进军火库之后，布朗派了三个人守在道路尽头，负责迎接前来投奔的黑奴。然而这三个人没接到任何一个黑奴，就先遇上了联邦军队。

这支从南方赶来反攻的军队，带队的上校恰好是后来在南北战争中大放异彩的李将军。论兵力火力，论军事能力，布朗当然都不是李上校的对手，没花多久时间，联邦军队就收复了蓝岭山军火库。再临的基督

这次战役的伤亡结果：被布朗绑架的一位蓄奴者和三位附近镇民，死在交战中。布朗率领的“勇士”中，有十人其中包括布朗的两个儿子阵亡。布朗的另一个儿子，和其他四个人逃走，至于布朗自己，则在受重伤情况下无法逃走，被联邦军队活捉，被送去审判，最终被判处绞刑。

布朗在绞刑台上断气的瞬间，李上校兴奋地大叫：“人类公敌统统毁灭吧！”然而在南方人眼中的“人类公敌”，却在北方人心里成了英雄，死掉的布朗，比活着的布朗，引起更大的

好奇与注意。

人们，尤其是北方的人们，不得不问：“为什么有人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将儿子也一起送上最危险的火线，只为了要帮助跟他完全不相关，他也根本不认识的黑奴？”人们，尤其是北方的人们，不得不进一步问：“为什么这个人具有如此的勇气与自信？为什么他不曾怀疑过上帝是 [现实] “非现实”的巨大力量(2) 不是站在他那一边的呢？”

一项表面上看来冲动、愚蠢的行为，一项实质上明确失败的行动，却在其愚蠢与失败的刺激下，有了新的生命。因为人们穿过实质事件与行动，看到了后面的原则思考。不是那么多人会同意布朗的做法，然而愈来愈多人认同他之所以如此愚蠢、如此失败的那份原则。布朗还是个行动上的失败者，但同时化身成了原则、

道理上的圣人。

远在法国的小说家雨果，特别写信请求美国联邦政府，释放当时还关在牢中等待执行死刑的布朗。雨果称布朗是“再临的基督”。美国哲学家爱默生则说：“他受苦，将使得绞刑架发光，如同十字架般。”写《湖滨散记》的梭罗，公开发表了陈情书，爱默生的儿子特地赶去聆听，他事后形容：梭罗在念陈情书时，“仿佛被那陈情内容烧着了”。南北战争开打北方对南方的不满，因为布朗事件升高了。北方的道德裁判倾向愈来愈强，南方护卫自己蓄奴利益的危机感也随而强化了。1860年，明确主张废奴的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南方哗然，联邦分裂，南北难免一战，历史到此走上了不归路。

美国南北战争，起因于南方要脱离联邦，林肯

是以维持联邦与宪法完整性为由发动战争的。

然而战争当中，刺激、鼓舞北军士气的，与其说是联邦、宪法，还不如说是布朗及其留下的废奴英雄事迹。

北军士兵人人朗朗上口的歌曲，就有一首叫《约翰·布朗》，歌词最后一句是：“现在，光辉的圣典来临了，所有人统统自由。”唱着这样的歌，北方军队慢慢将战争的焦点，从政治性的，转变成了社会性的，还转变成了人道性、原则性的。

别小看抽象原则的力量，也别太简单用成败论英雄，正义、道德，大部分时候看来很迂腐、很辽远，然而人类历史的突破，常常靠的就是这种迂腐、辽远的原则，才造成的。

约翰·布朗的恐怖屠杀的现实主张，是不足取的。然而现实上的失败，无法掩盖他“非现实”

的一面，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福祉，乃至生命，来为别人的自由奋斗，这种精神，反而被失败淬炼得更光耀、更美丽。 [算计]

避免经济算计的惰性(1)

一亿六千万年前，地球陆块分裂开来，马达加斯加岛从非洲离开。那是恐龙在地上、水中、空中繁殖活动的年代。

然后小行星撞击地球带来了毁灭性的烟尘，遮蔽植物赖以生长的阳光，间接使得恐龙“大灭绝”。不只恐龙绝迹，事实上马达加斯加岛的大部分动物，全在那场灾难中消失殆尽。没有原生动物，使得马达加斯加岛成了一块生态实验场，每隔几百万年，就有新的动植物透过不同方式移至马达加斯加岛，在上面互动繁衍。对演化学家来说，马达加斯加岛是再棒不过的生态圈。马达加斯加岛受邻近非洲动植物生态

影响，却又和非洲的演化不同步。有些在其他地方已经绝种的生物，在马达加斯加岛保留下来；更常见的是，许多生物迁到马达加斯加岛之后，进行了完全不同的演化过程。

估计生物学家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发现的动植物，有将近一万种不曾在别的地方出现过，其中包括二十多种最原始的灵长类动物，也包括全世界最大和最小的变色龙。当然，谁都不能忘掉马达加斯加岛上多到吓人的种种蜥蜴，体型不同、色彩不同，甚至连面部表情都不同。

如果要选一个最值得保存的地球生态区域，你选哪里？至少应该考虑最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马达加斯加岛吧！

然而不幸地，马达加斯加岛早已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蛮荒大地了。当然，马达加斯加岛上不会有像纽约那样的大城，甚至连像台南或中坜

一般规模的都市也没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达加斯加没有“开发”。

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火耕

马达加斯加岛上的马拉加西人，千年来一直过着“火耕”的简单生活。这种生活，简单且贫穷，却是生态的大灾难。他们用火烧掉森林树木，在烧出来的空地上种植兼养牛，然而没有了树根保护的表土，很容易就在大雨中被冲蚀掉了，露出内里的岩层。岩层上能长什么作物？够养什么牛？于是很快地烧出来的土地不足养活那里的马拉加西人，他们只好换另一个地方，再去烧起了另一把火。

被人类烧过、用过的土地，虽然只是最低限度的“开发”，也只带来极小极小的农牧利益，却就再也回复不了自然原貌了。没有表土连草都活不了，何来树木森林？没有树木、没有森

林，又怎么会有动物栖息生养的条件呢？

在某个意义上，我们从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ry频道上看到的马达加斯加岛上丰富的生态影像，只是假象。那些森林动物，转着大眼睛静悄悄就变化了身上颜色的变色龙当然是真的，可是它们存活的自然植被区域，目前只占马达加斯加岛全岛不到十分之一的面积。而且这些幸运保留下来的地带，几乎都是地形恶劣不利人类活动，散落在岛上各个不同角落。

马达加斯加岛那么大，上面只有少数的马拉加西人生活，然而马拉加西人却过得如此贫困。一直到现在，进入21世纪了，马拉加西人还有继续使用手工自制农具的，连斧头、长矛这种铁器，都还是最近二十年间，才在马拉加西文化中逐渐普及，这些连大部分第三世界穷国都视为稀松平常的东西，在马达加斯加岛还是昂

贵的财产。 没有数字就无法思考的时代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壮观的经济大浪费。大量的自然资源被破坏，还有许多稀有物种，在他们基因里藏着解开演化之谜答案的物种，因而濒临绝种，但是换来的，只是极为微小的人类经济生活利益。

我们很容易可以用今天盛行的经济数量公式，算出马达加斯加岛的经济总生产。不管用耕地平均生产收益算，还是用马拉加西人平均收入算，马达加斯加每年经济规模，再怎么乐观估算，顶多都只有几百万美元吧。

几百万美金，只够台湾向美国买几颗飞弹，或买一架攻击直升机，这样的数字，竟然就可以养活马达加斯加岛的人，取代他们无效率低产出的农牧业。

也可以这样换算，美国卡通片《马达加斯加》

的制作预算，也许够马达加斯加岛“火耕”停止十年。加上宣传费用的话，说不定够用十五、二十年。 “火耕” [算计]

避免经济算计的惰性(2)

如果停止十年，当然就有较大机会让仅存不多的原始植被区域不受破坏，使栖息其间的动物基因，不会从地球上灭绝。

如果单纯从经济计算上看，那么低的成本，为什么不投入？为什么没有人投入，真正去解救、保存马达加斯加的生态呢？

因为，单纯从经济计算来看，我们虽然算得出投入很低廉，却算不出来

那保留马达加斯加岛生态的经济收益有多少？

在没有收益数字的情况下，那么再少的钱也无法引发人家愿意投资了。

这正显示出单纯经济计算所带来的困窘。保留

马达加斯加岛生态，也不预设未来的利用，那么在经济计算上，其价值就只能是零。尽管经济学里近来多增加了风险的概念、未来成本的概念，虽然我们可以论证说保留马达加斯加岛自然植被可以预留地球基因多样性，也可以排放氧气平衡二氧化碳浓度，降低未来解决温室效应的开销，然而这些论证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无法明确量化，算不出数字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面对许多明明可以预防的毛病时，总是错失时机，要等毛病造成灾害，再来进行抢救。因为预防带来的效益，无法量化估算，抢救补救的花费却可以清楚算出来。

我们活在一个没有数字就不会思考、没有数字就无法衡量得失的时代，这是关键。这不只是经济学的问题，但作为资本体系背景的经济学带来的一套计算习惯，却一定扮演了重要角色

。

经济上简单的成本投入与收益产生二元概念，
理性且简洁地收拾整理了世界纷纭复杂现象，
使其彼此之间构成可以共量互换的关系，省了
我们许多脑力、少了我们许多困惑。但是，世
界不会因为人类的思考简化过程，就真的变得
简单、各归其位，不再有超出数学公式的部分

。

世界的复杂与纷乱，依然一如往昔。只是我们的
惰性偷懒地不再学习比较复杂的评量概念。
用经济计算来统一全世界，最后我们就会得到
一个简化无聊，不再能保护大蜥蜴、变色龙的
无情世界。 [复杂] 复杂反而安全(1)

戴高乐当法国总统时，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
抱怨：“谁有办法统治一个可以搞出两百四十
六种奶酪的国家呢？”

戴高乐这话，有一个部分纯属玩笑。那就是两百四十六个这数字，虽然贵为法国的国家元首，尽管他手下管辖的是全欧洲甚至全世界最有历史最庞大的文官体系，他都不可能真正弄清楚全法国究竟生产多少种奶酪。

如果戴高乐确定知道法国一共就有两百四十六种奶酪，老实说，这样一个国家就没什么不能治理的了，戴高乐那句话真正的重点，其实是在凸显国家机器、政府行政与民众生活间的隔阂，国家机器、行政体系掌握不着，更管不到法国人到底制造了哪些奶酪，怎么制造的，又进到了哪些人的肚子里。

法国会有那么多奶酪，道理很简单。因为法国的奶酪保留了高度手工业特质，小型生产是大宗、主流。再者，法国奶酪绝大部分是以传统方式用生乳制造的。生乳长了细菌进行了种

种化学变化，形成奶酪，这是奶酪最最基本的原理。想想看，空气里有多少种不同细菌，影响细菌和生乳产生作用的变量有多少，怎么可能算得清楚最后形成的奶酪有多少种呢？

法国人管不住自己的奶酪，看在美国人眼里，简直野蛮。在美国，一讲起细菌，一般人马上联想的就是肺结核和猩红热。换句话说，在美国人的概念中，细菌的自然角色就是致病来源，是纯然负面、可怕的。所以对待细菌的基本态度，首先是消灭，无法完全消灭，也得想方设法予以管制。

早在20世纪初期，美国联邦食品药物局（FDA）就严格规定，所有的市场上贩卖的牛奶，都必须经过高温杀菌的程序，加热至一百四十五度长达半小时，或加热至一百六十五度十五秒，确保牛奶中没有细菌存活。1947年起，FDA

又规定，所有的奶酪只能透过两种程序制造：一种是使用高温消毒过的牛奶；第二种是如果使用未消毒的生乳的话，奶酪必须经过至少六十天才能上市，让里面的细菌释放完可能的有毒物质，而且不再大量增殖，进入固定稳定的环境。

FDA的规定，使得美国人不可能吃到黏黏糊糊、稠嗒嗒的生奶酪，也排除了像法国或荷兰等地自然传统制程产品的进口机会，更重要的是，FDA的监管、检查，为了符合卫生程序所需进行的设备与人力投资，也使得美国小型家户式奶酪生产无以为继，酪农只好放弃生产程序，单纯做原料供货商，把牛乳供应给跨国大厂如Kraft、Borden去制成奶酪。于是这么几十年下来，美国人只能吃得到大厂标准制程造出来的奶酪，许多美国人以为奶酪就只有那么几种

，就只有那些基本、直接的味道。

卡拉丝的咏叹调

一直到他们有机会去了欧洲，到巴黎到罗马到阿姆斯特丹，吃到了人家的奶酪。虽然都叫奶酪，不理睬消毒规定、没有风干储藏六十天，用生乳制造的东西，就是大不相同。一个吃惯美国奶酪的美国人，在巴黎餐馆留下的赞叹最为经典：“我以前吃的是只是奶酪，今天在这里吃到的，是卡拉丝的咏叹调。”

是了，生乳奶酪最大的特色，为什么在美食烹调里那么重要，就在其不可测的复杂性。奶酪有其基本的味道，就像卡拉丝唱歌当然还是要照着谱来一样，可是在那基本味道之上，不同地窖不同木桶不同块的奶酪，却会有自己的个性。吃进嘴里时，不同元素依着不同步调从不同角度进攻你的味蕾与嗅觉细胞，时而狂暴时

而轻柔，时而包围时而突袭，时而热时而冷时而凉爽，在单音当中变幻着无穷可能。

怎么抗拒这种诱惑？更重要的，怎么能在尝过复杂如卡拉丝咏叹调的奶酪之后，回头忍耐干净单纯得乏味的美国奶酪？可以想见，长期以来，美国有着一个口耳相传的地下奶酪管道。

有人用不符FDA规定的方式做“另类奶酪”，偷偷卖给餐厅跟美食饕客。1983年，《纽约时报》记者私访八家纽约市内主要奶酪卖场，在每一家都发现了不合规定的奶酪；1985年，南加州出现一次一共有二十九人 [复杂]

复杂反而安全(2)

受害的生乳奶酪中毒事件。两件事在当时都构成轰动丑闻，让许多美国人“闻生乳色变”。

然而在报道生乳奶酪事件时，新闻媒体都忘了提一件重要事实。那就是从一九四八年以来，

美国曾发生过六次大规模的奶酪中毒事件，其中只有一次起因于生乳奶酪，另外五次惹祸的是消毒过的牛奶制造的奶酪。

相互牵制的多元

1990年代以来，美国人愈来愈讲究自然生机饮食，法式烹调概念被大量引进，终于吸引了科学家们认真去看待奶酪内的细菌作用问题。科学家们暂时卸除社会的偏见，回到原点，仔细记录不同制造程序产生的菌类效果，长期试验下来，得到了意外的答案。

有愈来愈多的生物学家相信，生乳制造的奶酪，会比消毒牛奶做的，来得安全。关键就在于：生乳形成的是一个多元环境，各种不同菌类在这里复杂互动，彼此影响也彼此牵制，如此一来，任何一种单项细菌要大量繁殖到对人体有害的地步，机会微乎其微。多元而混乱的环

境，保证了每一种细菌、每一个元素都在拥挤的自然情况下被中和缓解了，多元不只带来多层次的口感，多层次口感也同时取消了单一因素的破坏力。

相对地，将所有细菌一网打尽的“干净”牛奶，虽然让细菌很难进入，然而只要几株细菌成功存活，就会快速繁殖，换句话说，把关很紧，可是一旦被渗透了，就可能一败涂地。

小小的奶酪，其实就牵涉到一个社会如何看待“安全”议题。我们要的“安全”，是一个无菌、单纯的环境；还是多元、拥挤、牵制的环境呢？在政治哲学上，美国的民主显然属于后者，然而在食物领域里，美国人却长期倾向于前者，与法国的传统大相径庭。

戴高乐的抱怨，归根究底是抱怨法国社会太多元化了，多元到无法以一套程序、一个原则来

治理。不过表面上难治理的多元法国，毕竟也不容易搞出什么祸端来吧。极右派势力一抬头，法国的中间派和左派立刻联手，封杀了极右派独大的可能。这不正很像生乳里的细菌作用模式吗？

难治理又怎么样呢？难治理的法国才生产得出如卡拉丝咏叹调一般多元丰富、妙不可言的奶酪啊！

-----完-----
